作者的话

每当谈起我的语言素养，人们总向我提出三个问题。我呢，当然也总是作了相同的回答。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同所有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同志们一起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能掌握十六种语言吗？

答：不，不可能。至少，十六种语言掌握的程度不可能完全相同。我的母语只有一种——匈牙利语。但是，有五种语言同时存在于我的头脑中：俄、英、法、德和匈牙利语。用这几种语言工作时，我能自由地将其中的任何一种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能在一瞬间翻译出来。当工作需要用意、西、日、汉或波兰语时，我通常要先花半天时间翻阅一下笔记，温习一下。其余的六种语言我只能用以翻译文学作品和专业书籍，也就是说只有消极的实践。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您不从事语言教学工作？

答：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要想教（强调一下：是教而不是学），光懂许多种语言是不够的。要让我填写职业登记表的话，我就开玩笑地填：学习语言。教学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职业。经受过这种或那种外科手术的人肯定不少，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手术刀交给他们（我想谁也不会交），让他们就靠这种也许不算少的经验去给别人动外科手术。

第三个问题：要掌握这么多语言，需要特殊的才能吗？

答：不，不需要。我认为，除艺术外，人类任何一种活动的成效取决于兴趣的大小和为实践其兴趣而付出的劳动量的多少。喜爱语言并认真琢磨选词用字以求优美而独特地表达思想的人，一定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目的。这个结论是我用语言进行交际的经验之谈，是将近四十年积累的相当丰富的经验之谈。在这本书里，我仅仅想谈谈自己的一些观察。

书中的缺点是我的错误所产生的。另外，我也期待对本书感兴趣的读者能承认它的优点。

总之，此书献给读者。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卡托·罗姆勃是当代匈牙利的女翻译家，懂得十六种语言，其中十种能进行口译。她的外语主要是靠自学掌握的，学习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本书是她的经验之谈，对象主要是业余自学外语的成年人，对语言专业的教师、学生以及翻译工作者也有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苏联进步出版社 1978 年俄文版译出，俄译者为亚历山德拉·纳乌缅科。

目　　录

引　言

在我大约四岁的时候，我声称我懂得德语。这使家里人大为吃惊。

“别瞎说！”

“一点儿也不是瞎说。电灯是die Lampe，椅子是der Stuhl。既然如此，那么房间就是die Komnate，桌子则是der Stohl，不对吗？”

如果我的父母懂得一点现代的语言教学法术语，他们会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是反镜现象的牺牲品。”（反镜现象是指把不同语言中相似的词汇、语法现象进行错误的归纳而造成错误。）但父母亲只是笑了笑，可能有点发愁。看样子，是认定我将来学不好外语了。

起初，生活似乎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在民校[1]德语课上，我落在同班同学的后面。他们有的在家里

〔1〕指匈牙利四年制小学之后的四年制中学。

由德国小姐教过，有的本人出身就是德国人。后来，在中学学习时，我被认为是没有语言天才的，因此上大学时就选了自然科学系。

但这时我已经落入了外语的神奇的陷阱。我没学过拉丁语。有一次随便翻阅姐姐的书，偶然碰到了一些拉丁文俗语。我象着了迷似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拼读着优美动听的格言和匈语译文：Juventus-ventus（“少不更事。”直译为：“年幼似风”），Per angusta ad augusta（“祸不单行。”直译为：“刚过峡谷，又上高坡”）。原来用这些珍珠似的小砖块可以砌成沟通思想的桥梁！

用优美词句表达的民间智慧的几个谚语，一下子使我爱上了语言。

我请求让我旁听法语课。在民校里是可以选修法语的。无论学习什么课程，严格要求总是有益的。可是，让可怜的布达依太太当法语教师大概只能用她名叫克拉丽莎来解释。[1]我们的校长大概认为叫

[1] 暗指英国作家萨莫欧·理查森（1689—1761）的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这本小说的法译本特别著名。

这个名字的人一定懂法语。这位老师和我都很自命不凡。我永远忘不了：一个月之后，她分配我当值日生，我在词典里抠了半天才在黑板上写了句：La toute classe est bienne （不正确的法语，意思是："班上一切正常。"）

在大学里，我物理学得不怎么样，化学还不错。我特别喜欢有机化学，现在还喜欢。同时，拉丁语语法我也学得不坏。

语法是一个体系。谁要是真正心领神会地掌握了一种语言的语法，受过语法训练，谁就有了在一切领域中把知识系统化的能力。这对有机化学也一样适用。以一些基本句子作为例子学会了变格、变位之后，我们在有机化学领域里也能沿着逻辑大道到达最遥远的境界。只要每次用其它原子团取代甲烷和苯这两个基本的有机化合物的氢原子，就可不断获得新的物质——这点是不难掌握的。

……毕业考试临近了，我即将取得毕业证书。可是我知道，它毫无用处。大家知道，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

现在大学毕业的青年可能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不仅是拿着中学毕业证书的人，即使是拿着大学毕业文凭的专家，要给自己找个位置是多么困难。

于是，我给自己选择了另一个职业：我决定以教授语言为生。教什么语言呢？拉丁语我掌握得不怎么样。法语教师到处都有，比想学法语的人还多。只有英语还能保证固定的收入。可是，这里有另一个问题：我得先学会它……

我从那时起采用的学习语言方法（至今还在使用，下面几个章节里将要说明），就是在我当时的两位老师指导下制订的。

这种方法对别人是否适用？下面我将试作回答。这里我只想强调：如果谁象我1933年春天那样，在一间租来的房间里（我没有自己的住宅），坐在破旧的沙发上，那么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就一定会取得同样的效果。我用来学习阅读的第一本书是高尔斯华绥的小说。一个星期之后我就能猜测书里说的是什么，一个月之后就弄明白书的意思，两个月后

已经能够欣赏它的文字了。为了给未来的学生以牢固的知识，我抠完了风行一时的教科书《五十课》。直到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也没有感到良心不安，怎么竟敢按“边学边教”的原则来教外语，要知当时我往往只比自己的学生往前多学了两课书。我想，我的灵感和热情当时弥补了我在知识方面的不足。

我设法在制药实验室里找到一个拿半薪的工作。在那里，我曾试作笔译。我的试译看来不合格，因为编辑退回译稿时附了一句批语：“译者是个大胆的人。”

学习语言的下一步确实需要足够的胆量。这一步后来使我选定了一个新的职业。1941 年我决定学习俄语。

如果我在这里说我走这一步是由于政治上有远见或由于有思想基础，那是昧着良心说话。现在很难说，我有什么预见，或在政治上确实有某种见解。但促使我走这一步的，完全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情况。一次，我在考鲁特大街一家旧书店里翻找书籍，偶

然发现一套两卷本俄英词典。我爱不释手，立刻拿着这宝贝奔向收款处。这个决定并不需要我付出很大的物质代价：买这两本 1860 年出版的破词典只化了我 96 个斐勒[1]。

我在私人图书馆里找到了几本俄文古典小说，但没有啃动它们。一个偶然的机会帮了我的忙。

有一次在巴拉顿卡索[2]，我和丈夫住进了一家寄宿公寓。一家俄国人刚刚从这里搬走。侍女正打算把剩下的垃圾倒出去。我的目光突然落到一本厚厚的大字印刷的书上，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 1910 年出版的一本内容荒唐的伤感小说。我毫不犹豫地读了起来。我在这本书上下了许多功夫，以致至今有几页我几乎还能背诵出来。

到了 1943 年，我才能进行一些较认真的阅读。开始空袭了，美英飞机不断轰炸布达佩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那些时光，使我取得很大进步。但是，需要伪装。我买了一本厚厚的匈牙利文的百科全书，

---

〔1〕匈牙利一种低面额的纸币。

〔2〕匈牙利巴拉顿湖南岸的一个疗养城市。

一个熟识的装订工人帮我每隔一页贴上一张果戈理的《死魂灵》。在防空洞里的几个小时，我有时能啃完好几章。就在那时，我磨练出了阅读的技能。不认识的词我都“大方地”放了过去，因为在防空洞里使用词典是相当危险的。

战争初期，我们就确信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会成为胜利者，而到了1943—1944年，这就更加明显了。我终于等到了同第一个苏联人交谈并且炫耀自己的文学知识的机会。当时我说我读过果戈理的《死魂灵》，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苏联军官只是不置可否而客气地点点头，后来才明白这本书的书名俄语应读作Mjortvije dusi，而不是象我由于不懂语音只是按字母读成的Mjertvije。

1945年2月初，市政府大楼解放了。当天我就到那里去作俄语译员，他们立即给我办了手续。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给市警备司令打电话，向他介绍新市长。当我打听苏联警备司令部的电话号码时，别人告诉我说，只要拿起听筒那边就有人接。1945年2月5日，在布达佩斯只有这一条电话线路是畅通

的。

从那时起，学俄语的机会多得很。糟糕的是，我那时只能流利地说俄语（而且看来错误不少），却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同我交谈的人和我的翻译对象，都以为我有点聋，大声安慰我说，只要从饥饿中恢复过来，听觉就会正常的。确实，我的体重比正常人少了二十公斤。

1946年，我到盟邦监督委员会匈牙利办事处工作。对语言学家(当时我自认为是语言学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办公室里，交替说着英、俄、法三种语言。盟邦举行谈判时，我当翻译。我不仅扩大了知识面，而且获得了一个翻译所必需的熟巧，从一种语言闪电般地转到另一种语言，这是我首先学到的主要本领。

对“语言猎奇”的渴望使我开始学习新的语种——罗马尼亚语。我至今还认为它是极优美的语言。它比法语大众化，比意大利语雄壮，由于借用了大量斯拉夫语的句法和词汇而比西班牙语有意思。这个奇怪的混合体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只用

了几个星期我就读完了谢巴斯季扬的一本小说和拉斯洛·加尔第的罗语语法教科书。今天罗语我已经不会说了，但常有机会把罗语的科技文章笔译成其它外语，主要是英语。

各方面的行政和翻译工作牵扯了我的精力，直到1950年我才开始考虑另外两个新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那就是：我摸索出来的学习外语的方法果真对别人也有用吗？能通过个人感兴趣的阅读来接近一门外语吗？我偶然得到了一个检验这个论点的机会。当大学里的俄语教学达到空前规模时，我应邀负责教一个俄语班。由于培养的是未来的工程师，我认为把语言教学建立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兴趣上比较合乎逻辑。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班，当年还先后出了两本俄语教科书。尽管由于经验不足，教科书里有错误，但我承认这是我的“孩子”，而且至今感到高兴的是，当年我们小班制订的阅读专业文章的体系今天已经普及，成为我国所有高等学校的财富。

另一个问题也是早就使我念念不忘的：我很想

知道，我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学习那些无法依靠日尔曼语、斯拉夫语、拉丁语中的雷同现象的语言。检验它的机会也来了：在大学的东方学院开了汉语班。

我想把我第一次接触汉语的情况写得详细些，因为我把这视为我对语言、对学习语言的整个态度的象征。

参加汉语班可不容易。班上的学员多半是从大学生中，特别是语言专业的大学生中挑选的，而我那时已超过了从语言上“加工”的年龄。对我的申请未予答复。我只是完全偶然地得知：学习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星期。

深秋，一天晚上，我在大学的黑暗走廊里徘徊，寻找汉语班的教室。各层楼都找遍了，没有迹象表明楼里有人。我已经打算投降了，就象俗话说的把愿望藏进口袋里去。突然，我发现在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尽头有光亮：最后一个教室的门半开着。让人们去说我这是温情主义的蠢话吧，但我至今还认为，当时照亮了黑暗的不是那盏一百支烛光的

灯，而是我对知识的渴望。我走了进去，向一位来自上海的可爱的中国姑娘作了自我介绍，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就被优美的东方语言所照亮。

第二天，我就埋头于从公共图书馆找来的一本汉俄词典，试图解开一个谜：如何才能在词典里找到所要找的词。要知道，汉语里既没有字母表，也没有字母。

十二月末的一天，我从黎明时分开始翻译第一个汉语句子，一直到很晚才获得结果。这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这期间，俄语教师的数量大增，这使我们都感到高兴，也使我有可能让位给真正的教育者，而自己开始学习另一门新的语言——波兰语。报名时我耍了一个花招，我衷心愿把它推荐给一切学习语言的同行们，那就是：从超过实际知识所允许的更高水平入手。在初级班、高级班和进修班这三个班里，我选了最后一个。

办班的领导想弄明白我已经具有什么水平。我对他说："请您不要白费劲，我一个波兰词也不认

识。”

“那您为什么报名到最高班——进修班呢?”他诧异地问。

“因为只有什么也不懂的人才需要特别顽强地学习。”

我的厚脸皮使他不知所措。他二话没说，把我的名字写上了名单。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的汉语也已提高到能给代表团当翻译的水平，并且能一本接一本地把我特别喜欢的小说译成匈牙利语。1956年，我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学习其它东方语言的办法来深入学习某一种东方语言。当然，只能从类似现象中获益。于是我开始学习日语。这回可完全是独自一人学习了。关于我学日语的教训，我将在本书的另一章中再谈。

1954年，我首次获得出国机会。虽然从那以后我可以说走遍了全世界，但使我最激动的，是当我得知有机会随匈牙利国际旅行社去捷克的时候。我立即买了依凡·奥尔勃拉赫特的小说《无产者安娜》，

用已经习惯的办法解开了变格变位的谜，把这样分析出来的规则写在书页边上。由于我无情地使用这本可怜的书，当我回家时它已经破损不堪了。

从此以后要看懂和翻译斯洛伐克文和乌克兰文就不难了，但保加利亚文对我就比较费劲。也许是我处理不当？应一家出版社的邀请，我着手翻译一篇冗长的文章。那是一篇政治性文章，按我已具有的斯拉夫语知识，好象应该是胜任的。但结果却是惨败：我的三十页译文几乎让编辑重抄了一遍。

关于我掌握意大利语的情况，还有一段故事。四十年代初，一位来自考鲁特大街的私商想把一种制造鞋面的机器输出许可证“脱手”给意大利人。尽管我认真抠了词典，我的译文大概仍有不少模糊不清之处。可能正是这种神秘莫测的文风使得意大利人真的买下了许可证。

我接触西班牙语就更晚了，六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学习它。现在说起来都感到脸红，但我得承认，当时用来阅读的是一本最荒唐的美国畅销书《Gentelmen prefer blondes》(《绅士们宁愿要金发女

子》的西班牙文译本。读完这本书后，我用鲁道尔夫·基拉依的一本好教材来检验自己从书中归纳出来的基本语法规则是否正确。

我的兴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翻译上，因为布达佩斯日益成为各种国际会议的城市。关于这一极有意思的职业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这里只想指出：我第一次作同声传译非常顺利，代表们很满意，有一位代表甚至问我是否愿意到西德的一个会议上去当翻译。我感到高兴，并表示同意。当我接到书面邀请后，我觉得哪怕仅仅是出于感谢也应掌握好主人的语言。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我的学习生涯又回到了德语这个我曾经如此不光彩地学习过的语言上。

语言是什么?

可能，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只有几个字母、然而却与这么多概念有关的名词。

解剖学家听到这个词，想到的是口腔内一组向根部扯紧的肌肉[1]，饕食者想的是一盘煮的、煎的或燻的可口的肉块，神学家则会想到三一节[2]的动人的说教。对作家来说，语言是一种手段，其表现力仅次于大自然本身。对于诗人，这是一种乐器。它在匠师手中会产生如此珍贵的价值，掌握了它，你就会“即使在空无一物的苍天下，也不会两手空空”（安泰·谢尔勃）[3]。

以研究语言为职业的人，我们通常称为语言学

〔1〕指舌头。在许多语言中，“舌头”与“语言”是同音词。

〔2〕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十天。

〔3〕安泰·谢尔勃（1901—1945），匈牙利作家、文学家。

家。他们研究与语言有关的理论问题，研究语言与时代文化的关系。可惜还没有一个术语来称呼这样的一种人——他们仅仅是喜爱语言，努力学习语言，他们象别的人醉心于其它什么东西一样迷恋于掌握外语。据我所知，英语中表示这两种人的名称是不同的，后者叫Linguist（语言家）。我觉得Philologist（语言学家）与Linguist（语言家）之间的区别就象舞蹈学家与舞蹈家一样。因此，既然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就把单纯出于实践目的或为了满足本人兴趣而掌握几种语言的人叫做“语言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用“多语人”这个词，因为大多数“多语人”之所以通晓多种语言，是由于自己诞生的地点或其它生活条件偶然造成的，而不是对语言的兴趣推动了他们学习各种语言。

我们的话题仅仅是语言主义(Linguism)(请允许我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表达这一概念的词之前先使用这个词)，我在这里指的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努力掌握语言。如果下面我们多少涉及下理论，那只是出于两种原因：第一，语言家是睁着眼睛的人，是有

教养的人，因而对他努力从事的工作的理论感兴趣；第二，这种更为广泛的探讨能使我们更容易地达到目标——正确选择并有效地掌握所热爱的语言。因此在本书某些地方我决心承担这样的风险：一方面可能被专家们斥为简单化或不确切，另一方面却又被学生们责怪为过于理论化。

我们学语言是为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学语言？
我们什么时候学语言？

我们就把这几个基本问题作为出发点吧。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因为它最容易回答。

我们学习语言是因为：语言是唯一的即使没有学好也不会无用的东西。

如果有人只会拉一点点小提琴，那他很快就会发现，他强加给听众的痛苦远甚于可能给自己带来

的喜悦。一个业余的化学爱好者只有意识到自己学化学的业余性质，而不想与职业化学家较量，才不会使人感到可笑。医学上懂点皮毛的人也不会有多大出息，如果他想在实践中应用自己的知识，则有可能要承担诈骗犯的刑事责任。只有语言上的业余爱好者，我认为是能给公众带来好处的。

甚至语法上有错误的句子也能在人们之间架起友善的桥梁。如果在威尼斯车站打听哪趟火车是开往米兰的，由于句子错误而坐上了不是开往米兰而是开往布达佩斯的火车，那毕竟比根本什么也不会打听要好。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学语言是为了什么?"理论家和实践家都已写过许多文章。"目的"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致数年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单单为了这一个问题就召开了半年的国际会议。我在这本只谈学习的小册子中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达到目的的方法。

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

语言是一幢房屋。学语言就是建筑房屋。俄语

好比是一座复杂、和谐、厚实的教堂，有拱顶、凸壁、盾形装饰、半圆墙顶。以朴实著称的意大利语，其结构较为简单，建筑工艺也更简单，但如果某一部分建筑得匆匆忙忙，它也会倒塌。

不久前，我们从一个孩子妈妈那里听到下面一则可笑的故事。小彼得科过生日时，得到一只口笛、一个小鼓和一把小号。小家伙要求把这几件玩具分别挂在墙上。

“不行，”妈妈说，“墙上钉进去这么多钉子，人家会生气的。”

“干吗要钉进去？”孩子感到奇怪，“墙里头的钉子我不需要，我只要墙外的那一段就够了。”

每当我听到有人只想消极地掌握语言，我就想起这个小彼得科。

任何房屋象钉子一样，有内部支点才能站得住。如果支点不够深，稍一加重它就会完蛋。

语言这座大厦里有四间大屋子。只有进入这四间屋子的人，即掌握全部四种技能（说、听、写、读）的人，才能称作这座大厦的主人。谁想进入这

四间屋子，就必须克服一些最普通的障碍：象俄底修斯[1]一样，他必须战胜一个独眼巨人，名叫“又忘了学习”，而且宁可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也要抵挡住“今天电视有好节目”的诱惑。

当然，这个比喻并不确切。那个机灵的希腊人之所以能战胜一切障碍，是因为他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目的：回到祖国。对学习语言的人来说，旅程本身就能带来喜悦。这个路途就象登山运动一样，是一直向上的，每到一个新的高度，视野就更广阔，更美好。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学习就不是紧张的追逐，而是愉快的、满足我们智力需要的精神体操。我们学习语言，还因为语言学习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

第三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学语言？）在讲“中等学生”的那一章里基本可以得到回答。“中等学生”除了有种种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个成年人。所谓成年，就是说已经不是自动掌握新语言的

〔1〕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者

年龄（0—6岁），已经不是老问“为什么”或极少这么问（我指的是语言方面）的年龄，也不是6—12岁的年龄，即常常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但脑子还不能回答所有问题的年龄。

因此，关于“什么时候学语言”，只要确定上限就行。但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上限。

不要以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者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我这么说，是因为恐怕有人责怪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太主观。我可以引证维也纳大学一次教育学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摘要。

“科学研究推翻了传统的一种观点，说是到了壮年，人的接受能力大为下降。相反，研究证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速度（例如掌握外语）虽然减慢（与青年相比），但用较长的时间所获得的成果却与青年人所获得的同样牢固。”

另一个论点更使人振奋：“一个人的智力活动越多，他的脑子老化得越晚。”

“不是给生命增加年岁，而是给年岁增加生命。”这是研究生理老化的科学——老年学的一句口号。

如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几乎增加了十岁，越来越多的人“改行”成为精神抖擞、精力充沛的领养老金者，有了空暇时间。很可能，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新的“生活”就是学习外语。

学哪门外语？

选择的余地很充分。

如果相信圣经里传说的话，语言家这个职业的产生同巴比伦塔的建造有关[1]，同神与人之争、巴比伦塔的倒塌以及“语言混乱”有关……

要问现在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不可能有确切的回答。如果把世界地图用七种颜色来描绘，那就象在光谱中一样，在基本色之间会有无数过渡色。从意大利语到法语，中间要经过利古尔语和布罗温

〔1〕据圣经故事，巴比伦人想建筑齐天高的塔，因而触怒上帝。为了惩戒他们，上帝使巴比伦人各讲不同的语言，造成语言混乱，从而不能彼此理解，塔终未建成。

斯语。可以把它们看成四种不同的语言，也可以把布罗温斯语看作法语的方言，把利古尔语看成意大利语的方言。

在语言的光谱上，最明亮的要算一些所谓的“世界性语言”了。它们的“作用半径”好象总要盖过其它稍为“逊色”的语言，但它们从来也未成功，甚至拉丁语在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塔基尼的帝国中也未成功。奥维奇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次，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之王”得罪了他的最高保护人奥古斯特皇帝，皇帝把他逐出罗马，大诗人不得不住到郊区托梅去，那里生活着“野蛮人”，即不会说罗马话的人。奥维奇最感痛苦的不是放逐之耻，而是他这个拉丁语的“无冕之王”由于不懂当地居民的语言而感到孤独寂寞。他叹息道：“我在这里是野人，因为谁也不懂我的话。”这种对自己的新身份的评价是完全公道的。

他这句叹息的话可以翻译过来，但现在要理解它我看不可能，至少很困难。如今旅游事业已经成了许多国家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地方当局对外国

人肯定会关怀备至，并且会力图用这位旅游者的本族语向他提供食宿方便的。

如何学习语言？

我想，最可靠、最舒服、“最完善”的方法大概是：比如说，想学会英语，就投胎做英国人……这当然是今生今世休想了！我们在许多年前（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有的三十年前）都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

当然，可能有人从小就长期居住在英国。这是比较可行，但也是不易实现的道路。

可以做到的是：坚持勤奋地学习外语，每周学二、三次或更多些，四、五年后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水平。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对这个最常见的经典的外语学习方法做点补充。我的想法无论如何不能叫做劝告或药方。我只想谈谈二十五年中我如何达到能说

十种语言，能翻译另外六种语言的专业书籍并阅读这些语言的文学作品的。

如果只能按上面讲的第一种方法学外语，那我就需要投胎十次了。我能说的十种语言中包括象汉语、日语这样“复杂”的语言（我把“复杂”两字打上引号，不是因为这些语言似乎很简单，而是因为“容易”的语言是不存在的，最多是人们能较容易地学会用某几种语言，蹩脚地讲话）。

对外语或任何其它知识我都没有找到什么神奇的“芝麻快快开”[1]。我没找到，是因为它不存在。我之所以还想谈点经验，完全是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我从没有感到过学习是一种负担，相反，它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欢乐的源泉。

如果我认为我学习外语的方法仅仅具有个别意义，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深信：不论是谁，只要他渴望知识，只要思维逻辑领域中的探险对他来说不是受罪，而是一种愉快，他

---

〔1〕在《天方夜谭》（《一千〇一夜》）的故事里，这句咒语能唤开深藏着的宝库。

就能走我的道路。

有的学习者，其学习目的允许他，而时间分配又要求他走得慢一些。我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这些人的学习有专职的教师来管，而且能管得很好。我这里向大家谈的经验，不过是想使学习外语的过程变得愉快些，使不满足于通常速度的人不感到失望。

这本书对谁有用，对谁没用

我这本书是为实际上不存在的一种类型的人——中等学生——而写的。

“中等平均数”——这是世界上最抽象的东西。每当我读到一些统计资料时，我总力图想象这样一个不幸的当代人，即中等人，他平均有 0.66 个孩子，0.32 辆汽车，0.46 台电视机。

现在，在我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个中等学生。正因为他不具体，我想详细谈一谈。

他的年龄在16岁至96岁之间。职业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大学生、园丁、牙医、裁缝、领养老金者、总会计师。他有两个特点：他的空闲时间既不太多，也不太少。

如果有人能有无限的时间来学习外语，那材料的数量和学习速度可以要多大就有多大。因而，对他们的学习我这本书不想涉及。如果有人连一天化一个小时来学习语言的工夫都没有，那这里所建议的方法（其实任何其它方法也一样）也不会给他带来理想的结果。因此，以上两种极端都不是中等学生的特点。

最好是对一些超出学习语言范围的普遍性问题有点兴趣，并对用可靠而正确的老方法来学习的速度又有点正当的不满。

我想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要求有更高的速度，因而学习方法应当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

我并不想卷入烦琐的哲理和社会学议论，它们同这本书只有间接的关系。让我把上面这句话翻译成教育学上的语言：在任何时代，只有与这一时代

的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学习方法才能占据首要地位。

我想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简短地回顾一下学习语言的历史。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如德国幽默作家库尔特·季霍尔斯基所说的那样，任何研究性著作如果开头几句话不是"远在古罗马……"，就不算是严肃的著作。不，并非如此。我要提到罗马人是因为，正是在古罗马，我们语言家这个职业才开始扬名于世。

罗马人在最初几次远征的胜利鼓舞下，把兵力投向文化水平更高、语言更发达的希腊：

Graecia capta ferum cepit captorem et artes
Intulit agristi Latio … (Horatius)

被征服的希腊反倒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把艺术带给了严峻的拉丁…

（高拉齐：《寄语》，Ⅱ，Ⅰ）

胜利的罗马人贪婪地扑向希腊人古老的文化。为了掌握它，他们选择了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的方法。在征服者遣回拉丁的、满载掠夺来的财富的大

车上，坐着（或者在车后跟着）希腊俘虏，即罗马青年未来的教师。这一批外语教师的命运丝毫不值得羡慕。只是在从他们身上还可以“压榨出”一点东西来的时候，主人才需要他们。只要黑头发、鹰鼻子的罗马少年对学习开始感到有点厌烦，他的希腊语教师就立即变成可从事任何一种奴隶劳动的会说话的工具。

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丰富了的拉丁语又反过来向世界提供了不比希腊语逊色的优美的文学作品。到了封建时代，懂拉丁语又成了特权阶级的象征，即如今英语叫做 Statussymbol。拉丁语知识成为一种社会分化的工具，被用来排挤、欺压那些没有受教育权利的社会阶层和阶级。懂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妇女是极为罕见的，妇女学外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在十九世纪中叶，拉丁语还是正式语言，这种状况在匈牙利比在其它欧洲国家保持得更久。在米克萨特的小说中，高等贵族的太太们听到她们的丈夫用拉丁语“争论”，简直生气极了，因为这等于告诉夫人们：她们的位置应当在哪里。因此不言而

喻，“非高贵”的市民们如果想找出路，也得使用“懂得两种古典语言”这个手段。只要掌握这两种语言，年青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可以上升到封建贵族，另一方面又有别于那些既不懂拉丁语又不懂希腊语的人们。于是一种新型学校，即贵族中学应运而生，学校中的教学体系就建立在对这两种语言的学习上。以死背语言规则为基础的精神世界，既符合德国寄宿学校的军营气氛，又符合英国公学的教育体系，有时甚至发展成为暴虐狂。看来，disciplina这个词有“学科”和“纪律”两个意义不是偶然的。

起初，许多学习外语的人是学两种死去的语言，这就决定了这种教学方法的长期性，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摆脱了它的羁绊。

拉丁语和希腊语对发展交际的促进作用很小，更谈不上使学生能感觉到这些语言的组成部分如何变成建筑积木，紧贴着他的手，好象随时都想帮助他表达千变万化的思想和情绪。也谈不上现在我们要努力强调和追求的东西。

更明显的是，由于死记硬背，把发音问题完全

置于次要地位，何况我们公元前的祖先的声音既没有灌成唱片，也没有录到磁带上。据我所知，古代（古典）语言的发音问题至今未解决。例如，在英国，我们听惯了的“凯撒”、“齐泽隆”读作“西撒”、“西赛罗”，在意大利则是“切撒”、“切切罗”。其实，正是在英国，教条主义外语教学法的寿命最长，根深蒂固。议会档案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位爵士在发言中引用某一句拉丁语时，突然中断了，这时贵族院的议员们全体起立，齐声说完了这句引语。

拉丁语和希腊语在英国学校中持续的时间最长，大概因为大不列颠一向是传统的维护者！学生只要对古典语言稍有点概念，就不难掌握与发音关系很小的英语拼写法（所谓的 spelling）。Ocean 读若 oshn，theatre 读若 siete，但如果你感觉到它们象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 oceanum (okeanos)，theatrum (theatron)，立刻就不难写出来。

在上文提到的那些年代里，即上一世纪中叶前贵族们懂得外语（除了学习以外）主要靠超越国界

的婚姻，而城市平民则靠外国人的入境移居或自己移居国外。到了上世纪末，有了新的进展，对活生生的外国语的兴趣大大增长，靠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家庭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已远远不够了。

邮政驿车被火车所取代。国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对外国人民的兴趣增长了。贸易关系要求语言知识具有新的形式：掌握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用的口头语言。一种更现代的掌握外语的方法应运而生，于是舞台上出现了伯里兹大师和他的许多追随者。

伯里兹方法的实质是：物体（概念）和它的外语名称之间的联系不通过本族语来建立。

当弗里德什·卡林季的小说《卡比略里亚》中的主人公在海上遇难，来到海底女王驾前时，他试图用上述办法来引起对自己的注意："我采用了伯里兹的著名方法，指了指自己说：'人'。"

这种所谓的直接法推翻了古典语言教学中统治了多年的翻译法。

这个所谓的直接法在几十年的过程中不断完

善，成为外语教学法的基础。新的要求决定了学习语言的速度。

青年人通常是在十岁左右开始学习外语，当获得了普通教育的时候，一般可能接触到一种或两种外语。但是，这种教学法也仅仅是在私人教师教外语时才有效（因为要在不多于两三个学生的小组中使用）。学校的教学计划（如果不是某种专门计划）往往是靠从上一个教育学发展时期继承下来的方法来实现的。

语法训练，背诵那些随时都会遇到的例外现象……难怪青年人念完中学，学了六年或八年德语，离开学校时，脑袋里是“空空如也”。只有富裕人家的孩子才有可能获得多少有点用处的语言知识，而且还必须是父母愿意作点牺牲，孩子愿意作出一定的努力。从英国、法国、德国小姐等家庭女教师的教学体系（从学语言的角度看是有效的体系）中，不难看到古代罗马人对希腊教师的态度。这些被残酷剥削的“供人使唤的男女孩子”的任务不仅仅是教语言，而且还要教会少爷们“好的举止”。我对过去

这些我们这一职业的代表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首先，这些"小姐们"往往是妇女解放的先进战士，她们处境困难；其次，他们往往是当时匈牙利无边的市侩沼泽中唯一高举文化财富接力棒的人。

接着，又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同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间的青年人对待外语的态度迥然不同。出现了另外的目的，动机也有所改变。

迄今为止，学外语是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学生一旦开始独立的劳动生活，掌握外语的愿望便随之消失。这样，学习语言就同受普通教育在时间上一致，而一般教育的口号是"准备生活"，因而学习速度慢同学生的生活并不矛盾。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生活的人来说，学习外语的要求在毕业后并没有消失。新的目的不允许他们制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远景规划。世界上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与讲其它语言的人的接触，已不再是职业外交家、寻求推销商品新市场的商人或者苦于无所事事的到处游荡的有钱人的特权了。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和休息时间都会不断地同外国语打交道；个人兴趣和求知欲，友好感情和在新的环境中实现个性的渴望，都要求尽快地学会别人的语言。但人们对学习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也受到技术的影响。

谁要是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不是坐三天的马车，而是坐一个小时的飞机，谁要是晚上不是用汽灯照明，而是用手按电钮打开日光灯，那么他对学习外语也会要求用不太吃力的方法。

人毕竟是娇贵了（请不娇贵的人原谅我这样概括）。我们如今要求技术不仅减轻体力劳动，而且也减轻脑力劳动，最现代的所谓视听法就是用来减轻学习外语时记忆的必需的负担的。新的方法也能使人掌握良好的发音，而发音对于讲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极为重要。

伯里兹的追随者主要用"直接教学法"进行教学。连他们也认为，不出错误地熟练掌握非常用动词的非常用时态，远比好的发音和正确重读更重要。

人们曾期待自始至终运用听觉和视觉的视听法

会创造奇迹，结果所获得的只是不坏的实践能力而已。这种教学法的很大优越性在于学习材料的经常复现。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对学习语言来说，复习如镟床的钻头或内燃发动机气缸的活塞一样不可缺少。不过，这个简单的真理早在发明发动机之前就已发现。我们的祖先罗马人就曾经说过：复习是学习之母。

对我们这代娇生惯养的孩子来说，这种不使脑子过分紧张而尽量只用感觉器官的做法，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十九世纪的学校中，学习语法规则本身就是目的，而如今则有人开始断定：自觉地掌握语言规律似乎既无价值又枯燥无味。正如人们常说的，把脑细胞用在这种事情上太可惜。所谓浸没法(имперсионный метод)正是建立在这种原则上，这一方法诞生在美国决非偶然。在那里，“舒适”是所有人的偶像。记忆外语形式，靠每天许多小时的训练和不断地重复，而不必揭示其理论上的相互联系。思索是天大的错误，理解对学习效果似乎有害。给外国教师开办这类英语训练班的领导不断抱怨学

员，因为他们对机械掌握进行坚决的“理智的抵制”。

任何语言规则，比如法语中的形容词同名词一致，只要懂得形容词阴性通常由形容词阳性加-e来构成，就能学会。但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智力活动要少得多，例如机械地用无数例子来完成这一过程：*le* parc, *le* champs, *le* jardim elf grand （公园，田地，花园很大），但是：*la* maison, la salle, la chambre est grande （房子，大厅，屋子很大）……经过这样不断的灌输，头脑里也会形成正确的一致形式。娇生惯养的大脑对这种温和的、下毛毛雨式的复习比对要求自觉的集中复习的抵制要少得多。我估计，现代青年之所以离不开电视机，原因也在于此。

谁也不想否认这一技术成就对文化教育的作用。我在这本书里也不想谈论一个制订得好的放映大纲对遥远的农村或者对由于交通困难而不得不留在家中的大城市居民有什么意义。银幕上的图象要比字母容易认，懒散了的想象力对有动作的图象要比静止不动的图象反应快，配了音的电影镜头要求

付出的精力最少，用最少的紧张度代价就可获得某种感受。我认为，我们的青年读书太少，例外者值得赞扬！

用书本教育出来的我们这一代，虽然对电影、广播和电视大量普及的消极一面感到不安，但毕竟应当承认，这些技术成就除了提高普遍的文化水平外，对学习外语也有许多贡献。如今，学习语言的目的(这是需要一再强调的)，首先是在不同的各族人民之间建立联系和相互了解。

正是收音机、录音机、电唱机大大帮助了我们理解外国伙伴和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视听法也正是以各种方式利用了这些技术手段。

对应用视听法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如果有，那只是担心它应用得还不够。另外，我觉得，视听手段并没有解决学习语言的全部问题。

视听法所要求的技术设备毕竟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具备，更不用说这本书的首要对象——学语言的成年人！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即所有中等学生在必

要的时间内都有足够数量的辅助手段，那也不能把这种方法称作对有经验的成年人适用的唯一方法。

小孩子开始上学时，头几天家里人领着他去学校，以后小孩子逐渐习惯了，记住了：这个街角我应拐弯，到那幢楼房应向左拐。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到了陌生地方，例如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或陌生的市区，他就会寻找辨别方向的更快的方法，走最近的路达到目的地。他会掏出图表来，按图判断前进路上各种必要的标志，这些标志就是我们自己制订的规则。拒而不用这些规则，却去用儿童的不断试验、不断出错的办法去寻找规则，那简直就是荒唐。我们是成年人啊！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讲几句，来看看经常听到的“半个真理”。有人常说，成年人应该象他从前学本族语那样去学外语。我认为这种论断是不正确的。要让成年人进入儿童的心理状态，就象给他穿儿童衣服或让住儿童房间一样不可能。

婴儿的特点之一就是他还根本没有学习说话。拉丁语中的 infans（幼稚）这个词已经进入许多种

欧洲语言，在心理学中已经成了国际词汇（幼稚型的，幼稚型），这是一个复合词：前缀 in-加上动词现在时的形动词形式 fans（即“不说话者”）。

当婴儿开始说话时，他是同时接受物体及其名称的。外部世界对他是慢慢地、逐渐地展开的。他学会说话是因为生活的本能（最重要的动机）强迫他这样做。

成年人则已经具有丰富的智力和情感的世界。他不仅已形成了思维和感觉的形式，而且已经有了第二信号系统，即作为交际和表达思想、感性的工具的语言。这一整套已形成的系统如今必须重新调整。

我认识一位女教师，战争期间她被迫同自己的一个女学生一起逃离尼拉西分子（匈牙利法西斯分子——译者注）的统治而隐居起来。后来，他们终于安全地等到了解放。十岁的女孩子已经能够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苏联军官轻松地闲谈了，而女教师却还在同语言中的困难作斗争。“小夏娃当然容易罗，”她自我安慰说。“她只要把四年级的知识翻译

成外语就行了，而我却要把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所学到的一切都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

儿童和成年人的能力从正反两方面来讲都有区别。儿童掌握某事物是通过自动的方法，而成年人则是用逻辑的方法。这个普遍真理的实际例子，我不久以前在邻近的一个学校的一年级一次考试中见到了。这些七岁的少爷小姐以令人羡慕的自信一个接一个地背诵他们记得滚瓜烂熟的诗歌和散文，每人都背诵了一刻钟，熟得可以说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是当老师就其中一首诗的内容问道：“为什么我们把奶牛叫做家畜？”这些孩子都愣住了，课堂里一片寂静。最后，一个活泼的黄发小辫子挽回了全班的荣誉：“因为它不是野兽。”

我们成年人的脑子对已经听到的东西再重复时，会反抗，而儿童则只喜欢那些已经多次通过其意识的东西。他会一百次地请求你：“再讲一次花母鸡的故事。”

成年的标志之一是人对词的认识更充分。人越是有文化，对词义和词所表示的概念理解得就越清

楚，而且越不需要为了理解某个外语词（或新词）而去想象这个词的实际内容。

我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只是为了强调成年人不可能象以前学习本族语那样去学外语。有人曾保证视听法的技术手段会创奇迹，但却有点使人失望，就是因为成年人的第二信号系统（词汇的世界）是象视觉形象一样强烈的刺激因素。例如，要想学会一个相应的“树木”外语词，成年人用不着看见这个“外国”树，既不用看实物，也不用看画片，也不用看用纸和枝条粘成的“标本”，如同在印度的英国学校里至今还在做的那样。

所以要强调成年人和儿童的不同反应，还因为：大多数现代的学生处于同四分之一世纪前不同的年龄范畴。著名的匈牙利科学普及协会外语学习班学生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

学生平均年龄变化的原因是出现了新的生活目的。其后果则是学习语言的新效果。我们的同事——成年的学生，学习外语比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的要快而且好。不难猜测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他

们为自己规定了比大、中学生更为高尚、更为远大的目标，而那些学生学习语言多半是由于不得不学或者更次于前者，是为了应付考查或通过考试。

让我们勇敢地正视现实：匈牙利的男女青年在专科学校、中学、学院和大学毕业时，还不会俄语（我这里不谈那些值得赞扬的例外）。他们不懂俄语，也不懂其它必修的外语，就象他们的父母当年不懂德语一样。但他们的情况却要更困难些，因为上一代人同德语的关系比如今这一代人同俄语的关系要密切：过去许多家庭里的爷爷奶奶懂德语，而邻近还往往住着构成我国少数民族的萨克森人或士瓦本人（即德国人——译者注）。

塔马什·阿达米克博士做过统计：学过四——七年俄语的113个熟知俄语变格、变位和一些必要词汇的学生中，只有四个人能够正确地用俄语要一杯水！

学校里的俄语教学效果不好，责任不在字母表（不知为什么许多人都这么想），字母的写法不论何种年龄的人都可以几天就学会；也不在教学法，它

已经同过去的做法决裂而符合现代的要求了；也不在新的教科书，它们绝大部分是建立在现代的原则上；也不在语言本身，它并不比拉丁语或德语难学！问题在另一方面，花在学习上的时间通常不足以获得坚实牢固的知识。

一些专业化学校的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周时数象“语言”学校一样达到6—8小时，学生毕业时就会具有实际生活所需要的足够的外语知识。匈牙利的俄语翻译人员中，很大一部分人正是出自这样的学校，那里俄语的教学大纲是特别紧的。

有一个痛苦的教训必须记住：如果每周（每天更好）没有一定的密度，那用来学习的时间将被白白地浪费掉。

严肃的人通常避免作概括，但仍然会得出这样一个建立在统计资料上的结论：要想有效地学习语言，最低限度的时间是每周平均10—12小时。

每个开始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的人，必须先定出一张时间平衡表。如果他不能或不想花费必需的时间，那么在开始学习之前，最好三思而后行。

最低密度我认为是每周100—120小时非睡眠时间中的10—12小时。这个密度是不是最合适的呢？

在匈牙利成功地进行着所谓的“强化”班实验。但是，时间还比较短，还不足以证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获得的知识到底有多牢靠。

我上面谈到的最低限度的学习密度，从各方面看来都只是中等的，但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个已工作的成年人学外语时，还是以这些平均数字为依据吧。

如果我们认为每周少于10—12小时不可能有效地掌握外语，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的现代人，尤其是一个女人，从哪里能挤出这么多时间呢？

按照旧的、经典式的时间支配法，我们一昼夜二十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工作，

八个小时休息或娱乐，

八个小时睡眠。

从睡眠中能抽出多少时间来学语言，这只有预测未来的未来学家才说得上。睡眠教学法（即在睡眠时间学习）并非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个新方法，早在一九一六年就有人试验过。不过那时的材料不是外语，而是摩尔斯电码。知道这个方法的人相对说来并不多，因此不妨介绍一下它是如何应用的。

把要学的课文用本族语和外语打印在纸上，并把发音录在磁带上，每份约30个词，10—12个短句。学习者先熟悉课文，然后躺到床上，跟着录音把它重复若干遍之后把灯熄灭，继续播放录音 40 分钟，声音越来越低。一清早醒来前，把这一过程颠倒进行一遍：播放录音，声音由轻到响，25—30 分钟后，声音响到使学习者能醒过来的程度。然后重把课文发给他，但这时只发给用本族语打印的课文。最后，学习者把已掌握的外语课文口述并录下音来。

实验证明，学习十八份材料之后，平均能掌握800—900 个词汇，也就是说比同等时间内用传统教学法学习多掌握五、六倍。这个结果是令人充满希望的，而且从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被认为是

“可能无害的”。

可是，我们还不能依靠这种看起来象很有前途的办法。我们应当从现实出发：把外语学习和工作、娱乐或休息结合起来。不是有害于它们，而是一种补充。

这种初看起来象“胡说八道”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先看工作。现代人的相当一部分劳动是用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从提高工程师、熟练工人、音乐教师、医生、贸易工作者（把所有的职业都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的专业知识这个角度说来，懂得外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多次。现在把问题倒过来说说：专业知识在外语学习中起什么作用？

用外语交谈时，专业知识起的作用有点象翻译员；阅读外语书籍时，它们起的作用象词典，而在外语学习中，它们本身就是教科书。这句话可能不大好懂，我们用例子说明一下。

一九五六年我开始学习日语时，匈牙利既没有

相应的教师，也没有教科书。我开始学习的材料是一份化学方面的进口许可证，我大胆（而又轻率）地决定翻译它。大量的插图、表格、附图、说明等，对我完成这个看来好象没有希望的任务给了很大帮助。首先我应当根据文字来判断这种语言的语法性质：是象匈牙利语那样的黏着语（词和形式靠黏着词的附加部来构成，取自拉丁语的aggluto，即黏附）呢，还是象德语或俄语这样的屈折语（建立在一定的内部和外部词尾系统上，其语音结构和词尾有变化）呢，还是象汉语这样的孤立语（物体与概念间的关系靠虚词而不是靠后缀或词尾来表示）。我设法弄到一本词典（当然，专门的词典根本没有）。可是，翻译过科技文章的人都知道，词汇知识最丰富的来源（可惜也是唯一可靠的来源）总是原文本身……谁要是在词典中找到，假定说符号 a 表示酸，符号 b 表示水，那么，凭着在中学里学的起码的化学常识，他可以引伸出，c 和 d 这两个符号在 $a+c=d+b$ 这个化学算式中显然是：c 表示碱，d 表示盐。

我学日语的例子当然是极端个别的现象，因而也许是难以仿效的，不论从正面还是反面说都如此。当然不是每一个中等学生都有这种耐心，首先不见得有这么多时间来做这种研究工作。这个经验之所以不成功，还在于：我的同行们极少碰到类似的情况。但是，对任何语言、任何学生、任何知识水平都适用的规律是：专业知识是打开外语大门的钥匙。

按照经典的时间分配法，除了八小时工作和八小时睡眠外，还有八小时我们好象只用来休息或娱乐。这两件事都可以叫做“消遣”（匈牙利语叫 váérés，英语叫 leisure，法语叫 loisir）。匈裔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德·加鲍尔认为，目前正在成长的这一代人的生活特点，将使这种“消遣”日益增长，他们将要生活的时代将叫做 Age of Leisure（消遣时代）。但是，即使不靠未来学家的预测，我们现在就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睡眠和工作之外的八小时，把学习外语同休息娱乐结合起来。

每当有人问我是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

如此多的语言上取得成功的，我总是默默地归功于一切知识的源泉——书。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也是一个号召：让我们来读书吧！

让我们来读书吧！

书是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主要工具。早在我出生之前，无数人已发现了这个新大陆。但是我想对这个众所周知的论点补充（或许也是重复）两点：第一，不要害怕从第一天起就把阅读列入学习语言的计划；第二，要积极阅读。

书是学习的“家用工具”。假如我们愿意今后也借助它来进行学习的话，让我们先给自己提个问题：所有这些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我这里再强调一下，别人多次发现了的，我又为自己发现而且到处为之辩护的这个学习语言的方式，不是要代替教师指导下的语言学习，而是补充它，加速它。

我们可以看到，教师指导下的学习具有下列特点。无可争辩的优越性是：获得的知识很可靠。上课时间是固定的，所以按规定时间去上课即可，并不需要太多的自我约束，而如果按自己规定的时间去学习，则必须有严格的自我约束。缺点是：进度慢，相当多的时间在“空转”（如果教师不了解我的学习能力，课程进度可能对我来说太慢）。最后还有，很难使自己的空闲时间与上课的时间一致起来。

我认为，想找一个完全适应我们个人精神素质的教师，不仅在农村或离文化中心较远的小城市里很困难，就是在首都也不容易。师生间的协调以及他们行动的配合，就象夫妇间或人与人之间的其它关系一样，是能否取得成就的关键。同样的课，对性格活泼的学生来讲可能枯燥无味，而对习惯于慢条斯理地学习的学生来说就可能过于紧张。

即使有幸能找到那么个教师，他的“血液流动”速度和我们一样，也仍然不容易协调课程节奏和周围的现实所提出的生活节奏。在大城市里，虽然不存在缺乏教师的问题，但是无数时间消耗在交通上。

到了下班时间,交通更是特别紧张。“把用于坐电车的全部时间加在一起，我可以学会德语。”我的一位朋友叹息说。

要是成年累月地向私人教师学习，还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复杂问题。这个办法本身不错；但经济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抛开经济负担不讲，向私人教师学习还有个缺点，即很难在六十分钟内把注意力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上。如果两、三个人一起和教师学习，也有个实质性困难：几乎不可能挑选到那么恰好的伙伴，能使敏捷些的不往前赶，而迟钝些的不拉后腿。活泼一些的学生,不管教师作出多大努力，总是使消极一些的学生“感到喘不过气来”。在大班里则有另一个特殊危险，即：更经常听到的是同伴的蹩脚的发音和语法错误，而不是教师的正确发音和正确无误的言语。

实践证明，三个人在一起学习的效果最好。第一,同伴间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互相督促的小竞赛；第二，这样，每个学生的注意力有时都能略为“休息”一下：我们都在这里，都听得着，看得见，但

不紧张，而是象心理学家说的那样，在松弛状态中上课。

最后，教师指导下的传统学习方法甚至有点难以捉摸，因为有时不知如何辅之以家用手段，主要是阅读……下面儿章里我们就来谈谈阅读。

为什么要读？读什么？

人的本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就象民间谚语所说的：“鱼往深处游，人往高处走。”人总是寻求愉快而逃避——尽量逃避痛苦。

应当读书，哪怕只是因为书籍以十分吸引人的形式提供知识。另一种学习方法（每天“死背”20—30个单词，消化老师给的或教科书里现成的语法规则）最多只能使我们觉得尽到了责任，而未必是愉快的源泉。如今谁也不把这样的钻研看作培养“斯巴达克”性格的方法了。但如果我们把学习当作一种精神的运动，当作猜纵横字谜、猜谜语，当作试

试自己的能力或者对自己能力的测定，我们的学习就不会遇到任何内心的反抗。

“从语言里学语法，而不是从语法里学语言。”上世纪末德国就有人这样说过。图森·兰根沙依特教学法的这句座右铭，在学校里教授死去的语言时就是教学法领域内的革命口号。而在我们今天更为明显的是，书是外语最可靠的体现者，同时又是课本。因此，上述格言需要补充：书不仅教给语法，而且是扩大词汇量、学习词汇的最有益的工具。

本书有专门一章论述词汇量，但鉴于问题的重要性，这里也无妨简略谈一下。获得词汇量，这是使大部分良好愿望破灭的深渊。儿童年龄所特有的自动记忆一去不复返了，成年人思维的逻辑性也无济于事。要知道，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别人的思想，都需要掌握成千上万的词语。

我们先不说那些论述“平均词汇量”的大批教学法著作。这里只举唯一的一个数字：匈牙利的《袖珍词典》通常收有二万至三万个基本词汇。在下面几章里谈到对语言知识的评价时，我称之为第四等

水平的是掌握这些词汇的50%至60%。

谁如果掌握了某一种外语的这个数量的词汇，可以问问自己：这个相当大的词汇量中有百分之多少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学到手的（即从词典里找的或经过某人给解释过词义的）？很明显，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词是从书本里“自然而然地”学来的，从比词典、教科书或教师方便得多的阅读这个源泉中获得的。

成年人的大脑与其说是在学习语法规则的时候，不如说是在掌握词汇的过程中受到考验。初看可能奇怪，掌握词汇需要的不是机械方法，而首先是深刻理解。不过，正是语法遭到我们崇拜技术的青年的强烈反抗。这是相当糟糕的，因为一个人没有语法知识只能学会说本族语（而且仅仅是说，不懂语法别想学会写！）。

人类思维有一个特征，即对任何新现象、新印象的反应都问：“为了什么？”“因为什么？”在语言里，解答这些问题的正是各种规则，尽管它们可能不合逻辑。无视这些规则会是致命的错误，就如在

科学中无视化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的规律一样。

我们不能赞成匈牙利解放初期一位业余俄语教师所采用过的方法。这个人二十年代到我国来侨居。一九四五年春，有志学习俄语的人请他教俄语。他教他们说：男孩俄语是 мальчик，女孩是 девочка。有人问他：为什么作直接补语时是 мальчика 和 девочку 呢？他冥思苦想了一会，耸了耸肩膀说：“有什么好说的？这不过是俄罗斯主义！”

不，没有语法就如同没有词汇一样，雄伟的语言大厦是建不起来的。我们只是反对早在上个世纪就被证明有害的，把学语法当作目的本身的语法主义。

这里我们遇到两个极端：旧学校把语法当作目的，而如今的学生甚至把语法当手段都不愿接受。

只有中间道路通向真理。人们自己的切身经验迟早会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

规则需要理解。在漫无边际的精神文明世界中旅行的成年人，和作其它任何旅行一样，要寻找路

标，要认识规则和规律。可是，不要以为找到和认识了规律之后，人的行动就会正确无误。规律只是一种原则，而原则仅仅是可以正确地建设起某个建筑物的地基而已。

在十字路口我们看到红灯就停了。这种反应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思维过程（“如果我不顾禁止的信号，就会引起事故，交通警会处罚我，我会招致生命危险”）。我们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而且遵循这种反射。先理解了原则，然后产生习惯，随之正确行动就成为自动的了。这种“行动规范”在外语教学法中有许多著名的名称。心理学上称之为“行动模型”，英国语言学派叫作“模式”，而我给它起个普通的，可能十分不科学的名字——“模子”、“样子”。

如何把匈牙利语的肯定句变成疑问句？很简单，变一下语调就行。Beszél angolul.（您会说英语。）Beszél angolul?（您会说英语吗？）

如果您想说英语，那您得知道，英语的语调同匈牙利语的或俄语的完全不同（甚至在十五分钟的电视课上，英语语调要占二分钟！）。因而，要在意

义上作这么大的变动，最好还是求助于专门的助动词，而不是语调。He speaks English.Does he speak English? 在理解原则的基础上很快形成模子，而有了模子在手，就可照它裁出各种新的样式。

若是有人不喜欢“模子”这个比喻，可以另用一个较有诗意的词——“音叉”。我敢说，要想张口说出一个外语词来，每次都得用音叉。我们强迫这个词发出声来，而且用我们的“内部耳朵”来听它。如果我们想说的东西听起来不错，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想说的。

学习语言就是制造这样的模式（模子、音叉）。凡是能帮助我们比较快地掌握最大数量的最可靠模式的方法，就是学习语言的好方法。形成这些模式的先决条件是接触正确的形式，无数次地重复它们，一直到成为自动化。我们的积极练习会促进自动化的形成，而它的效果则决定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不轻信这些现成的模式。

达到这两个目的（制造模式和重复模式）的最好工具就是书本，所以让我们读书吧！

书可以塞到口袋里，扔到某个角落里，可以在上面随意划写，可以拆开，丢失了还可以再买。书可以放在书包里带着，可以在喝茶时读它，一觉醒来时可以看它，睡前可以翻它几页。不用打电话向它请假。自己失眠时，不让它睡觉它也不会生气。可以把书的内容囫囵吞下，也可以分成好几段。书里的情节引人入胜，能满足我们的猎奇愿望。只有我们可能厌烦书，而书不会厌烦我们。

只要我们认为这本书对我们有用，认为它不次于另外一本书，它就总是我们忠实的伴侣。

我们这么重视读书在学习外语中的作用，因为它是一种最简单、最容易的工具，虽然对于创造语言“小气候”来讲它可能不是最有效的。

“语言小气候”这个词在专著里没有碰到过，但这个词很好理解，我相信不会是我的发明创造。和我们所在国的语言“大气候”相似，我说的“小气候”是指直接围绕我们的语言环境，而这种语言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给自己创造出来。过去“德国小姐”和“法国小姐”（指家庭教师——译者注）曾

在伯爵的城堡里和匈牙利市民家庭的儿童卧室里，为托付给她们的少爷们创造过这种小小的语言环境。对现代的中等学生来说，我们能支配的手段是更为大众化的：书和人。人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在最不愉快的时刻我们也不得不忍受这个“人”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推崇在四周无人时进行外语独白。让我们回忆一下出色地掌握了无数种外语的我们的同胞阿尔米尼亚·瓦别利吧。他从小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不是在学校里，也不是向老师学的外语，而是靠词典和外文书籍，靠自言自语，靠同周围无生命的东西说话……

我自言自语时，总可以要求“对方”不要想得太久，不要拘泥于语法是否理想，而且可以用匈牙利词代替外语词。独白可以是不出声的。开始阶段不出声可能更好，因为第一，不会因此养成错误发音的习惯；第二，谁也不会误认为我们在“发神经病”……

我们感到不习惯的并不是不出声地想，而是需

要学会为自己表达思想。心理语言学家认为，任何有声的言语之前都有一个无意识的不出声的构思过程。不仅如此，我们把所听到的一切都似乎在心里再重复一遍，把它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而我还长期以为这种内部的听不见的自我谈话是我发明的呢……

只要有一点毅力，我们很快就会习惯于（尽管简单粗糙）用外语把一些小小的印象、日常琐事说“出声”来（出声！）。

有一次，我在西班牙南部安达露西亚呆了几个星期。我独自一人，与当地居民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我也没有去找他们，说实在的，也无法去找，因为我的发音同西班牙人的十分难懂的口音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样，“大气候”对语言实践没有用上，如果不算那些广告、布告、橱窗里的书名和题词的话。在这样的真空里，我成功地学会了用西班牙语进行无声独白，并养成习惯，以致在从西班牙去英国的路上我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去使自己转向英语，因为第二天我就得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担任

英语翻译。

语言小气候比大气候优越，还可由以下事实得到证明：成年时期离开祖国的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掌握新的语言。从战争末期甚至从二十年代就居住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匈牙利人，由于未曾有意识地学习语言，最终也没能学会正确无误地说外语。并不是他们没有学语言的才能，而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匈牙利语的环境，跟孩子、朋友、同事说话全是用的匈牙利语，他们住在几乎与当地居民隔绝的匈牙利侨民区。

令人信服的相反的例子也不乏其人。有人多年不讲外语，但说起来仍然很流利。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能用他们经常有意识地“说”“内心独白”来解释。我建议我的同行——中等学生们，有意识地学会“内心独白”。

让我们回到书本上来。问题来了：读什么呢？读我们感兴趣的。德国谚语说：兴趣比爱情更有力量。确实，兴趣能战胜人类最可怕的敌人之一——厌倦。

必须看到，对于词汇量不大，语法知识不多，用不太完善的语言熟巧作指南针在句子的丛林中漫步的人说来，阅读在最初不会带来多大乐趣。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会出现一种迟钝的感觉。必须有某种东西来克服这种感觉。

这个"某种东西"就是阅读的兴趣，书籍的趣味性。

一个人的兴趣取决于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和个人爱好。我曾问过用这种方法"钻了进去"的人们：什么东西帮助他们克服了"死点"？下面我按收到的顺序和原来的形式把答复照录如下：

С.П.，**领取养老金者**："为了整理我的集邮册，我读了一大堆外文索引。"

М.Э.，**三年级中学生**："如果你不知道国外著名的足球队正在准备举行哪些球赛，你会感到落后于生活。"

Н.Б.，**打字机修理技师**："要知道，我有一个发明。在申请发明权之前，我必须搞清楚，我是不是发现了新大陆。"

В.К.，**理发师**："我对电影明星的一切都感兴趣。"

Ф.П.，**老奶奶**："西方出版的当代爱情小说里什么都写，什么不体面的事情都有。"

М.А.，**某部的处长**："我酷爱侦探小说。语言再难，我不弄清所有的细节决不把书放下。最主要的是：结局到底怎样？"

Л.И.，**印刷厂女工**："我哼着哼着我喜爱的外国歌曲，就会想：我不是可以学会和弄懂歌曲的意思吗！"

М.И.，**售货员**："一切都是从梅格莱的惊险小说开始的。如今我自己都能用法语任意写这方面的题材了。"

В.Ш.，**医学院一年级学生**："想认真研究一下精神病学。得懂两、三门外语。现在我已经能用德语阅读了。"

Р.М.，**装璜美术家**："在外国杂志上多次看到漂亮的室内装饰、家具、服装，但上面写的什么，怎么做的——读不明白……"

阅读越是能充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就越不需要用自我约束来克服“死点”。

我们总不会在学骑自行车时摔了第一跤就把车子扔掉，或者第一次从山上滑雪橇板不成功就把雪橇板劈了当柴烧吧！尽管因此我们身上有些久不愈合的伤口和青紫斑，我们还是经受了考验，因为我们懂得：危险会一次比一次小，技巧会逐渐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愉快。

何况，这里讲的不是什么新的世界。要知道，我们时刻都在同语言打交道，因此我们总能掌握语言熟巧的。要学会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就必须具有这种熟巧。

要发展语言熟巧，最好是阅读一些文字优美朴实的现代剧本、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艺术描写的潜台词里包含着所谓的“情景部分”，它和潜台词一起会不知不觉地印入记忆。当我们遇到和书中描写的相似的情景时，它们就会由于联想而再现出来。

“有情景的”文字的优点是，它通常提供最必需的词汇和语法模式。缺点则是靠自修掌握它们比较

困难。

任何一个摩拳擦掌打算学习外语的人，要准备对付的不是一种语言，而至少是两种语言——笔语和口语。由于感兴趣或由于条件所迫而采用我的方法的中等学生，学笔语的困难要比学口语少些。

任何一本书里都有所谓描述部分，这时作者好象是在援引自己的话。由于他是职业的优秀文字大师，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优美的规范句子。同样，如果教师是好教师，他说话时总是努力做到措词得当，造句正确。

亲爱的中等学生同行们，让我们看看，如果不注意爱护本族语，它在我们口中会被糟蹋到何等地步！写起来会拼错字母，说起来咬词不清，断句不当，丢三拉四，弄错支配关系。肖伯纳曾说，他懂三种“英语”：写剧本用的是一种，与人正式交往用的是另一种，而同朋友谈天用的是第三种。这三种英语多么不同！不过，每种语言都存在的这种“分化现象”，在英语里显得特别突出。众所周知，英语是拉丁语和日尔曼语两大语系融合而成的，因而英

语里熔化了两块词汇的巨石：诺尔曼语（法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

最常引用的例子如“牛犊”、“猪”、“公牛”，在英语中各有两个词。这些牲口本身用 calf（德语 kalb），swine（德语 Schwein），ox（德语 Ochs）表示，因为饲养这些牲口的老百姓是日尔曼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吃这些牲畜肉的人则是征服者老爷诺尔曼人，所以“牛犊肉”、“猪肉”、“牛肉”这几个词则具有拉丁语词根：veal（法语 veav），pork（法语 porc），boef（法语 boeuf）。

大家都知道，和外国人交往时，听有文化的人说话比听没有文化的人说话好懂。但我有一位熟人，在伦敦呆过，精通德语，对法语一窍不通，他却惊异地发现一种相反的情况。他听交通警中士说话比听有教养的同行们说话好懂。出于语言实践的兴趣，他有时信步走进教堂去听传道（这个老办法我也常用：参观名胜后，疲惫不堪，就去听听传道，权当休息）。我的朋友感到十分懊丧，听英语传道竟一个词也听不懂。他不明其中道理，又渴望解开这个谜。

正好有个教堂里散发讲道的文字材料，他拿了一份带回家去。我们一起看了看传道的文字材料，发现里面全部词汇都是由拉丁语词根组成。我们当即把英语译成英语，只是用日尔曼语词根替换拉丁语词根，每个词都找到了相应的词（例如 to commence——to begin 等等），简直好玩极了。

在文学作品的描述部分，这种分化现象较少。英国文学作品里（其实不仅是英国文学），语言比较单一。如在描述里，没有象在口语里各种不同程度的礼节所要求的那些东西。象“请赐予”、“冒昧”、“承蒙”等这样一些词日益少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可喜的成功。但遗憾的是，象“请”这样的词也越来越经常被遗忘。之所以遗憾，是因为仔细想想这个词的本意，就会发现它的内涵有多么美好！只有在特兰斯瓦尼给旅人递上一杯葡萄酒时说的话，才能同它比美。

但在有些语言里，如日语，文学作品的描述部分对掌握口语完全无用。日语的特点是，甚至象“走路”、“说话”这些最简单的动作，都随说话者属于

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而用不同的词表达。不过，对此很快就能习惯，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里都有“帮会式关门主义”的残余（如“请拿去”——“喏，给你”，“敬礼”——“你好”）。另一种现象学习起来就困难得多：同一动词的变位要因说话对象的年龄和社会地位而异。最不客气的形式，说话者用于对自己，如果无意中用了另一变位，离开了“妄自菲薄”，则可能造成笑话，就好比用任何一种“正常的”欧洲语言说：“明天我将光临你家。”

现代剧本和小说里对话很多，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可贵的口语词汇。在这方面，古典作品通常用处不大。有一次，我问一位用摩尔·约卡依[1]的作品学习匈牙利语的德国朋友，她喜欢不喜欢她旅馆房间的新邻居。她回答说：“姿色尚可，但过于矜持。”

为什么有些词二、三十年之后用起来很可笑，而另一些词也是旧词，却仍保留其有用的意义呢？这谁也不知道……同样，为什么我们接受了一些新

〔1〕 摩尔·约卡依（1825—1904），匈牙利作家，其作品反映了浪漫主义传统。

词来表达我们生活中早就存在的一些事物和现象，却抛弃了表示这些概念的旧词，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找到答案。象 контора（办公室）、круглосуточно（昼夜）这样的词，我们用起来毫无反感，而 приказные палаты（衙门）、днесь（旦夕）这样的词却模模糊糊，甚至根本不认识。我们接受了 вертолет（直升飞机），而摒弃了 геликоптер（直升飞机），用了 автомобиль、автомашина（汽车），不用 самоход（自动车），尽管这个词和 самолет（飞机）一样合乎逻辑。在医学方面，新的术语如 пневмония（肺炎）和 воспаление（肺炎）一样广泛使用，但 метаболизм（新陈代谢）这个词尽管比俄语或匈语中的译名都短而且是单义，可却连医生们都不大愿意用，甚至根本不用。这是什么逻辑？词的命运是不得而知的。

教科书里，甚至我们匈牙利目前出版的会话手册里，也常常使用一种生搬和硬造的（简缩的）语言，因此不能作为学习口语的可靠资料。有一次我随手翻阅一本《旅游会话手册》，读到里面一段要人

们熟记的对话，想象它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我愿参观贵国的名胜古迹，以及主要的农产品。"

一个匈牙利人同外国人作如下交谈是很可能的：

"我们去喝点黑的怎么样？"

"啊，请慢点说，我没听明白：去喝什么？"

"我说，去喝点黑的！"

"黑的——指黑咖啡？"

"当然罗！"

"不行，我得回那个……怎么说？……客人在的地方……"

"回旅馆？那么再见！"

可惜，教科书和教师很少提供这类"不十分重要的"单词和成语。不论每个国家如何为语言的"纯洁性"而斗争，恰恰是这一类词，而不是那些"文明的"、修辞"纯洁的"词语在日常口语中打破了复现率和常用性的全部记录。

最后，言归正传。我再说一遍：在我们没有真

正的语言环境时，文学作品能向我们提供这种最好的对话模式和使用的方法，因此要在迈出学习语言的第一步时，就开始阅读文学作品。

怎　样　读？

起初要粗读，但也不要太泛。然后认真地细读，精读。

我尤其主张男性同行们，特别是“懂技术”的男同志们，先粗读。请男同志们原谅我这种“另眼看待”。

我常常发现，男同志即使在读浅显易懂的东西时，也用大部头的词典。读到书中一个词，就查一下词典。毫不奇怪，这样做很快就会感到厌烦的。他们想起现在快广播新闻了，应当打开收音机，就会松一口气。

认真是一种好品质，但在学语言的初期它不是动力而是阻力。用不着每个词都查词典。如果由于

不断地停下来查词典而对书失去兴趣，那就太糟糕了。一定要弄清楚书中跟踪搜查罪犯的侦察员、政委、郡长或什么别的人是躲在什么树丛中，是在刺花李灌木丛中还是在山楂树丛中，有什么必要呢？

如果这个词确实重要，它会在上下文中反复出现，或是自然而然地明朗化。这种靠上下文的猜测得到的印象，比机械地反复查词典所得到的印象要深刻得多。经过一定的脑力劳动而达到了理解，这就说明我们是积极参加了意义联系的复现，说明这个语言难题是我们自己解出来的，由此而获得的喜悦比成功地猜出纵横字谜要大得多。

“成功感”使我们的劳动变得轻松愉快，而且使疲劳变得不足道了，甚至一篇平平常常的文章也会带来生活的乐趣。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借此说的是：在任何阅读中，对我们来说最有趣的是——我们自己。

某个词的意思是我自己猜出来的，整个句子的意思是我自己猜出来的，这种不由自主地对自己感到满意，就是奖赏。可以在想象中拍拍全人类的肩

膀。付出的劳动得到了报偿，手中有了继续工作的动力。

经验证明，在学习外语上，成功的开端十分重要，要从一开始就养成阅读的习惯。人们不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习惯。重要的是，在外语文章不好懂时，要学会不垂头丧气。

如果好久不游泳，一下钻进冰冷的湖水、海水或河水里，谁起初不感到不舒服？谁不想马上回到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沙滩上去？可过一会儿，习惯了凉水，谁又不为自己没有屈服于最初的感觉而高兴？外语文章的引人入胜和趣味性肯定能帮助初学“游泳者”克服内心的反抗和胆怯。

叙述的车轮转动起来了，心理的飞轮越转越快，现在该学会刹车了。我们克服了胆怯，兴奋地放下了书，明白了书中讲的是什么，这时该放慢阅读速度，把文学成品变成原料——学习的原料。我建议在“通过阅读来学习”的第二阶段，把信任自己的口号改为不信任。

在匈牙利文学中，据我所知，只有卡里曼·米

克萨特在《也是绵羊》这篇优秀的短篇小说中描述过语言学习。有一个作家给几个儿子请了个法语教师——一位法国姑娘。孩子们千方百计抵制学习，而且深信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实际上不懂法语。他们争取到了父亲的保证：一旦他们能证明这姑娘的法语并不好，就免除他们的学习。为了证明教师的无知，这几个孩子废寝忘食地抠词典，背规则，终于不知不觉地掌握了基础知识。

我们在第二阶段也不要轻信，而要多疑。让我们把单词和句子当作试金石，来检验作者是否忠于他所用的语言的规则吧！

我可以向你们预告结果。安德烈·莫鲁阿的法语比我们好，薇拉·潘诺娃的俄语、泰勒·柯杜埃尔的英语都比我们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不会胜过他们，但会得到好处。我们的知识会巩固，会牢靠。对了，刚才我提到这三位作家的名字不是出于偶然。他们的作品文体流畅，自然可以用来作为“活动活动手脚”的最好材料。

对于那些无论如何也不敢阅读用真正的语言写

成的作品的人们，我诚恳地劝他们读经过改写和注释的书，例如苏联进步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出版社所出的书。改写本依然是世界文学巨匠的作品，只是出于教学的目的在词汇和句法方面作了些简化。你们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在图书馆里借到。不过我不十分赞成借，有一条谚语可以改成这样："钞票喜欢清点，书本喜欢铅笔。"

每部文学作品里都包含着整个语言现象，就象大海是由点滴的水珠构成的一样。如果我们有耐心把一篇文章拆开又拼起来，搅浑后再使它静止澄清，我们就会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拉伊奥什·科舒特的话现在常常为英国的修辞教科书所引用。他是在奥地利的监狱里学会英语的，而他的起点是莎士比亚某一剧本里的十六行字。他说：

"我名符其实地不得不去发明英语语法。当我发明了它，并且在莎士比亚的十六行字里成百次地翻过来倒过去弄明白了之后，我的英语就已经达到了只需要增加词汇量的程度。"

阅读与发音

掌握语言意味着理解别人，而且善于用别人也能明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教学过程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书面语和口语中掌握这两种熟巧。

理解书面语和口语的内容是一种分析过程，而表达自己的思想则是一种综合活动。

上述两种熟巧缺一不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被迫作出某些牺牲，但往往不是由于原则上的理由，而是由于时间不够。

这两种熟巧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但经验证明，它们也可以分开来掌握。我在罗马遇到过一位旅馆看门人，他能说七种语言，每一种发音都相当好（包括匈牙利语），但哪一种也不会正确地书写（甚至连意大利语也不会写）。亚诺什·阿朗和山道尔·斐多非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译著，可是他们对发音却一窍不通。

遗憾的是，书本不能教会正确的发音。几年前，我在伦敦机场目睹了一个有趣的场面。一位所谓“入境检查官”手里转动着一个印度学生的护照，大声念道：“旅行目的——学习。”

“学习什么科目呢?”这位官员颇感兴趣地问道。

“Love,”学生回答说。看来Law（法学）这个词他只在纸上看见过，因此把它念成Love（爱情）。

这位官员具有真正的英国人的沉着冷静。他不动声色地放这个学生走过栏杆，然后才低声嘀咕说，“Love”全世界都一样，不值得跑这么远来研究它的看来非本质的差别。

发音是学习语言的困难任务之一，也是我们学习成败的重要试金石之一。虽然不懂词汇和语法也行不通，但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头几分钟，人们首先根据发音来评价我们的知识。在评论我们的能力方面，发音所起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一个女人的外貌。美丽的女人在刚露面时“总是有理的”。过些时候就会清楚，她既愚蠢、无聊，又毒辣。但第一眼的印

象总是对她有利的。

语音教学的历史比词汇、语法教学短。人们只是在开始大量学习活的语言以后，才真正对语音予以重视。尽管时间不长，在社会舆论中却已形成了一些假象。让我们逐次来分析一下。

“要想发音好，必须有好的听觉。”要说需要好听觉，也不是日常所说的“好”听觉（即音乐听觉）。比如，许多优秀的匈牙利音乐家过去或现在都能说好几种外语，用词和造句都很生动、正确、风趣，但是匈牙利口音很重。我看学好发音必须具备的素质不如说是察音能力，即通过听觉辨别外语发音和本族语发音的差别。

“要掌握好的发音，只要多次反复听好的发音就行。”这种说法也是假象。这种想法天真得就象深信只要仔细观察伊·罗德尼娜和阿·沙伊采夫的全部动作，第二天我们也就能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公园的人造冰场上作转体三周的动作……

体育冠军和他的教练是通过长年累月的刻苦努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每个细节动作都练得精疲

力尽，才获得精湛的技巧的。请先别反驳。我知道“中等学生”不打算到世界语言奥林匹克会上去表演。但是，学唱歌的人尽管不打算当一名伟大的歌手，却仍然要整小时地，整周地，整月地，整年地进行唱谱练习。要想获得好发音，当然也要经过类似的唱谱练习。语言教师通常把它叫做“盘练”。

婴儿的呀呀学语，对父母来说只是无上美妙的音乐，而对他自己来说则是勤奋的唱谱实践。他好象在试一试，他自己如何发出象周围的大人和已学会说话的孩子们所发出的音。而与学习外语的成年人来比，婴儿具有极优越的条件：他不需要忘记另一串音，他的起点不是字母。成年人对字母的反应则是成了反射性的音。

在布达曾办过一个普通学校，那里从一年级起就教授法语。我的儿子也在这所学校上学。我去听过几次课。全体学生都把 quatre 读成 qiat。我只好叹气。坐在我旁边的另一位家长同情地说：“他们不会说 qiatr，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词里有 r 这个字母。”

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人必须首先听到单词，然后看到它？我看不行。原因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这种长时期的、“远景”的获得词汇的方法不能用于学习过程，即使只要把单词听过一、二遍就可以正确掌握其语音，换句话说，即使不考虑我们的头号敌人——遗忘。

和遗忘作斗争只能通过复习。只有复习才能使与有声词相见的次数增加到每个人所需要的程度。但这一点就是在自然的语言环境里也难保证做到，更不用说远离所学语言的国家好几千公里了。

虽然我已经多次谈到过这一点，但还是想引起我的同行们注意，能保证单词无数次重复的只能是书本。只有书可以“使人开口”无数次，书不会使我们失望，它们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书虽有成千上万条优点，也有一条缺点：它们不能说“出声”来，更谈不上发音纯正，不带南腔北调。没有别的办法，必须学会外语语音规则。不是粗线条地，而是自觉地把它们同本族语发音规

则对比，即用所谓对比法。

这对于听觉接受能力较强(至少比视觉强些)，因而从听觉方面“进入”语言的人来说是必需的，对那些可以无限使用最现代化听觉实验室的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英语词 film，有些人一听就能念对，但是更重要的而且归根结底更正确的是，自觉掌握英语中并没有短音 i 这一点。一个好的教师(如果没有教师，就是广播和电视）的任务，就是引起我们对这一类“细小”规则的注意。

这仅仅是劝告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难的方面。复现“音——重音——节律”这一整体的熟巧也很重要。依我看，天之骄子——男人，在这方面远远不如女人，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女人我才这么说。许多心理学家都肯定，男人的模仿能力总的说来不如女人。(你看看周围——多数翻译人员、外语教师或其他精通外语的人都是女人！）我有这样的印象，好象男人“不好意思”（也许不需要引号?)作面部表情，他们不具有这种表情，而掌握新的音首先

就是学会新的面部表情，或者说学会表演。您是否注意过，当您的朋友改说外语时，他的脸也变成"外国人的"了：如果说德语则是德国人的脸，说英语则是英国人的脸，说西班牙语是西班牙人的脸？这不是眼睛的错觉。发新的音时，确实有一些新的脸部肌肉参加活动。

因此，谁想真正学会外语发音，他必须努力进行"唱谱练习"，不断地训练本族语里所没有的音和音组。"练哪些呢？音有这么多！"首先练习那些发音部位错误会改变词义的音。

匈牙利语的 e 这个音有很多种读法。但不论在外多瑙区，在佩斯，或是在阿尔菲尔德，ember（人）这个词怎么念都不会引起误解。而英语中读闭音 e 的 bed（床），其词义和读开音 e 的 bad（坏的）却完全不同。当今西方文学里常提到的 bed manners（床上事），决不可和 bad manners（坏行为）混淆。

这里我想建议你们注意两点我的切身体验。第一，语音的 drill（训练）必须用该语言中所不存在

的词来进行。英语称这些词为 nonsense syllable (荒诞的音节)。如果它们在视觉印象上和某一存在的词有联系，则尽量回避它们。

对我们匈牙利人来说(其实不仅对匈牙利人)，w 和 v 的发音特别难区分，那我们就无数次地重复下列音节：wo-vo，wa-va，we-ve，wi-vi，等等。在散步、游泳、等车或者对着镜子梳头时，都不难练习这些音，尤其是梳头时效果最好，因为对着镜子您可以检查发这个音时所需要的特殊的面部表情。

另一种对语音错误的观察，也是相当有效的。要自觉而积极地倾听发音错误。这对学习语言极为必要。有一次，我的一位"警觉的"女友说："我最初是从齐·勃拉赫菲尔德的《匈牙利语》一书中来理解德语的发音规则的。"

在中等条件下学习外语时，听广播是掌握正确发音极为重要的手段。我想，用不着说，其前提是必须自觉而积极地对待它。"仔细听听"我们所熟悉的每个音，比我们自己对它的想象长些还是短些，弱些还是强些。如果每次我们哪怕只是接近于掌握

一个音，那我们很快就会掌握一套优秀的语音“模式”。

词和句的正确旋律，对掌握单音和它们的正确发音起着更大的作用。学会这种旋律要困难得多。最好的办法是把广播录到录音机上并反复地听。这里也用得着一条古老的规则：完成任何一项任务，重要的不是时间长短，而是紧张程度。如果您的注意力由于疲劳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放松了，脑子里在回忆昨天的某个印象，或在订明天的计划……，就不要不惜一切代价整小时地坐在收音机或录音机旁。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市场上出现的可以录像的电视附件是很理想的。它能把您所喜欢(或需要)的节目录下来，以便按需要无数次地重放，或者播送现成的电影录像片。看电视是学习语言的好方法，因为电视常常放大面部形象，这样我们不仅能听到音，而且还能根据面部表情和嘴唇的动作“看到”音。当放映原版外国电视片（不是翻译片，而是带字幕的电影）时，就能听到所学的语言，而不懂的

地方用字幕来检查。

人们都学习哪些语言？

七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调查，但是后来没有发表详细材料，只是在总结报告里以调查表的答案为基础作了暂时结论：人们努力学习接壤国的语言，因为邻国的语言能在日常生活中带来最大的好处。

即使如此（我个人对此极表怀疑），匈牙利也是个例外。过去在匈牙利学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的人并不多，特别是老一代人。直到现在它们在匈牙利的“行情”也不高。我们匈牙利与世隔绝，这使我们匈牙利人不得不扩大地理语言活动的半径，以取得通向广阔世界的“身份证”。象瑞士这样的国家，当然好办了。它的居民讲三种语言，而且三种都是世界性语言（德、法、意——译者注），再加上一门“外语”，比如说俄语或英语，瑞士

人就打开了通向半个多世界的大门。

一个成年人选择某一种语言来学习时，其根据是什么呢？父母建议自己的孩子学某一种语言时，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通常根据两个相反的因素——语言的有用程度和掌握它的难易程度。

关于语言的有用性，我们将在语言的未来这一章里讲述。关于掌握外语的难易问题，我想指出：在匈牙利学外语的条件已相当好，具有足够数量的教师、词典、教科书、理论的与实践的材料，因此客观上不存在困难。我们在判断有没有可能掌握某一门外语时，经常是从我们的主观想象出发的。

我们常听到一些外行人说，语言有：

容易的和困难的，

美的和不美的，

丰富的和贫乏的。

我们先看看第二个“范畴”。有人说最美的语言是意大利语，它悠扬悦耳，柔软无比。我们感到它悦耳是因为意大利语中元音多而辅音少。德语一般认为没有吸引力，其实它的辅音感染力很强，因而

很美。它的辅音多，其音组更丰富多采，使人们有可能用声音来描绘极其多样的生活现象和精神世界。语言的音质在诗歌中表现得最充分（如果我们想一想诗歌在每一个民族文化起源中的作用，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因此上面的论点最好用诗歌的例子来说明。德语可以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凯的这几行诗来赢得音乐迷们的好感。

Erste Rosen erwachen,
Und ihr Duften ist zag,
Wie ein leis-leises lachen.
Flüchtig mit schwalbenflachen
Flügeln streift es den Tag…

（最早的玫瑰醒来了，
它们的芳香羞羞答答，
就象那轻轻的笑声。
它用燕子般的翅膀
触动了这一天……）

请注意诗中r、l、ha、f这样的辅音的运用。

俄语在声音方面是较柔软的，它的元音与辅音具有同样宽广的音阶。在掌握得好的人的口中，俄语的音调既悲伤又温柔，既雄壮又柔和（如果不是需要与偏见作斗争的话，那我对一切语言都可以这么说）。例如，为了表达对爱人的温存，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使用了多么柔和的声音：

Белей лилей, алее лала,
Бела была ты и ала.

（你长得又白又红，
比百合花白，比红宝石红。）

但语音外表并不是最主要的。如果不懂语言，如果不会在语音上无懈可击地、有意义地说话，那么对语音外表的判断只会是表面的和错误的。贝拉·佐尔丹在其著作《语言与情绪》中公正地指出：“语言的声学现象不可能脱离其意义引起的效果。”

词的硬或软首先不是取决于音的结构，而是取决于发音时的腔调，而后者又是语义和说话人的情绪所决定的。фиалка（紫罗兰）这个词多么悦耳！这是温柔动人的花儿。фискал（告密者）这个词多么使人憎恶、不快！而构成这两个词的音几乎一样。Андалусия（安达露西亚——地名）这个词听起来优美、浪漫，而вандализм（破坏文物）则听起来粗鲁不堪，但这两个词来源于同一个词根。同一个音组表示轻快的曲调时或表示丑恶的昆虫时，我们对它的反应是不同的。

就音响的美来说，捷克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得分不高。一般舆论指责它们辅音连缀“太出奇”。对塞尔维亚语可以举这样一个词组为例子：chrpi vrh(黑色的顶峰)，——它几乎全部是辅音！捷克语也有人觉得不好听，因为其重音总是在第一音节，再加上辅音太尖厉。对匈牙利语的评价也不算太高，指责是各方面的：尖厉的重音（音节不拖长）总在一个地方，“无法发音的”辅音连缀又单调又生硬……

“你怎么称呼自己的爱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有一个意大利士兵问自己的匈牙利战友。

“Galambom（我的鸽子），”这个单纯的马扎尔人回答道。

“Bim-bom—galambom!”意大利人奇怪地说。“这是敲钟，而不是亲热！”

许多人都曾试图赋予某些音以生动的情感。我看，谁也没有象杰若·科斯托拉尼做得那么富有诗意：

1	2	3
Lengelány,	Lelkembe	Minthogyha
aki szö	hallgatag	a fülem
holdv lág	dalolom,	szellöket
mosolya:	lallala,	hallana,
ezt mondja	dajkálom	szellöket
a neved	a neved	lellkeket
I lona	lallázva,	lengeni
Ilona.	Ilona	Ilona.

4

Müezzin
zümmög igy:
“La illah
il’ Allah”,
mint ahogy
zengem én
Ilona.

5

Arra, hol
feltün es
eltüm a
fēny hona,
fēny felē
ēj fele
Ilona,

6

Balgatag
álmaim
elzilált
lim-lomá,
távoli
szellemi
lant-zene,

7

Ó az i
kelleme,
ó az l
dallama,
mint ódon,
ballada,
úgy soh‌ájt
Ilona.

8

Csupa l,
csupa i,
csupa o,
csupa a,
csupa tej,
csupa kēj,
csupa jaj,
Ilona.

9

És nekem
szin is ez,
kēk-lila
halo vány
anilin,
ibolya,
Ilona.

10	11	12
Vigasság	Elmùló	Lankatag
fájdalom,	ēletem	angyalok
nem mulik el	hajnala	alēló
soha,	alkonya,	sikolya,
a balzsam is	halkiló,	Ilona,
mennyei	nem múlo	Ilona,
lanolin	hallali	Ilona,
Ilona.	Ilona.	Ilona.

我们也可以用一般的办法确定，在具有固定意义的词中某些音更经常出现。例如，表指小意义的词中的 i：kis，kicsi，pici（小，细小，微小——匈语），俄语的 мизинец（小指头），little，itsy-bitsy，teeny-weeny（小，小小的，极小的——英语），minime（极小——法语），piccolino（小的——意大利语），chquito（小——西班牙语）。而表示“雷鸣”的词，如 dörgēs（匈），Donner（德），tonnere（法），

thunder（英），它们响亮威严，难道不是因为其中有很多 r 音吗？

这样，语言的美与不美，经常看其发音——婉转还是生硬，柔和还是尖厉。其它因素，如构词的灵活性，似乎不起作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喜欢俄语，我封它为第一名。

据说，黄金是最高贵的金属，因为只要用一小粒就可以压轧成直径为一米的薄片，而且还不改变它的任何特性。俄语就是这种高贵的、可塑性强的语言；任何一个俄语词都可以无限地拉长。

以 стать 这个词为例（只有一个音节！）：

стать	lesz, válik valamivē
ставить	helyez, állit
оставить	hagy
становить	alapoz
становление	kialakulás
приостановить	felfüggeszt
при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felfüggeszt, fékez, megállit

при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meg-megáll

приостанавливаемый megállitható

请注意，译成匈牙利语时，要改变词根。匈牙利语在构词方面也是极为多产的，但不同于俄语的是其构词更符合抽象逻辑，依我看，更为“直线化”：词干不变，加上一个个相应的具有一定意义的后缀，每个后缀都在逻辑上补充、确切或概括词根的意义。但匈牙利语词干本身的意义是很丰富的，可以把它比作某种原材料，它不仅可以借助后缀来构成新词，还含有不同词类的特征。因此，说不定我的俄国同行就象我喜欢俄语一样，也喜欢匈牙利语。概括起来说，语言的丰富或贫乏问题，就象语言的美不美一样，是一个懂不懂语言的问题。如果语言中的某一领域不发达，那么这种不发达（相对的概念）会以其它方式在这一语言的其它领域中得到补偿。

说到语言的困难，我们就得浏览一下语言分类学。象匈牙利语一类的语言叫做黏着语。这种语言通常认为是难学的，因为正如我刚才说的，当一个词加上后缀或在句中的位置有所改变时，词干的意

义就改变了。经验证明，由于词形本身就表明它在句中的作用及它和哪个词发生联系，因而消极理解容易得多。我只要一看到俄语词 лаяла，就知道这是动词过去时，是谓语，和阴性主语有关，于是就不难在句中找到这个主语。而把这个词译成匈牙利语，则是 ugatott，其词形只说明它是过去时，至于它是动词还是名词，是不是说明语，是什么性的，如果不知道词根和匈牙利语句法的特点，就无法断定。

表面看来，好象“孤立语”应该较为简单。英语部分地具有孤立语的特征，但最典型的代表是汉语。方块字不告诉我们它是主语还是补语（宾语），如果是补语是什么补语，如果是动词是什么时间，如果是名词是什么性。

这样，黏着语并不比孤立语更难学，有所失必有所得。

我们要求语言表达我们的一切愿望、思想、感情，表达单一涵义的、不含糊的概念。如果某种语言的结构使词的形式不能表达单一的涵义（即不能

用形态手段来表达单一涵义)，则这种语言的句法会更严谨，词序会更严格，更固定。

学习匈牙利语的外国人，比如说，需要掌握 -t 是直接补语的后缀。如果这个外国人的本族语是形态不发达的语言，那么学习这条规则就相当费劲。其实学习这条规则时，可以不用去死记，也不用绞尽脑汁去想各种词序（匈牙利语中词序是相对自由的)。如果撇开细微的意味不谈，túrót eszik a cigány（奶酪茨冈人吃）和 cigány túrót eszik（茨冈人吃奶酪）是同义的，因为有后缀-t。如果语言中没有这个后缀，那么词序（这时词序就是严格固定的）一改变，就成了“奶酪吃茨冈人”了。

这样，每一种语言都力图提供最大程度地、没有歧义地和充分地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完善的，直到找到能消除可能产生的误解的方式。有些语言中，这个过程还是不久以前才完成的。

因此，语言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用以表达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各种可能的思想和感情。如果有人

由于害怕芬兰语动词的语法复杂而不敢学它，那就请他想一想，一般看法认为“不难学”的英语中，词汇的组合体系是多么复杂，同一个词每次都会有不同的词义。

例如看来平平常常的动词 to turn，它的意思是“转动，转弯，改变，翻转”，但有时在一些词组中这些意义全都不见了（这是与我们的母语相比而言，至于按照英语的逻辑，这些意义是全都保存着的！）。这些词组要作为句套、短语来单独记，如：

I turned down 我推翻

you turned 你出现了

he turned in 他躺下了（口语）

we turned over 我们翻转，转交，考虑

you turned out 你们熄灯，赶走，驱逐

they turned on 他们打开了

在 he is turned on 这样的现代“流行语”中，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服用麻醉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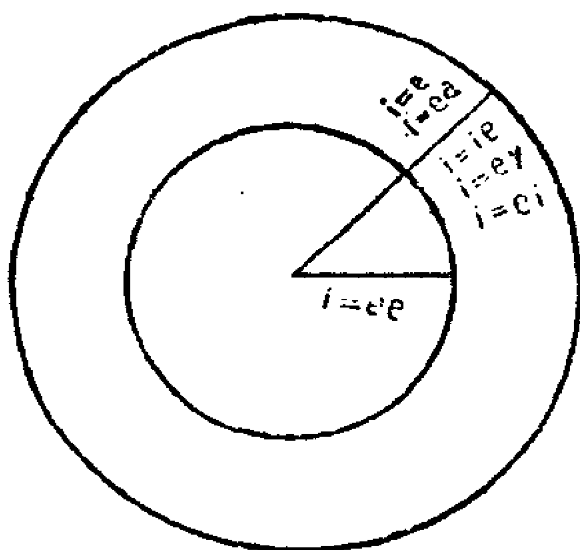
语言的难易问题（假定这个问题有一定价值的话），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哪种语言规则的作用半

径很有限，哪种语言就很难。换句话说，某一语言领域的规则本应作用于整个领域，但它们只作用于其中的一部分，则这一部分越小，就越需要更多的精力来学习这一领域或整个语言。

我们从构成语言体系的三大类基本规则（语音、构词、句法）中拿出第一大类来看看。

如果语音规则的作用半径不大，即同一个音要用几个不同的字母来表示，那么，这种文字我建议叫做“非语音”文字。

例如英语中我们能掌握这样一条规则，即ee读作长音i，但遗憾的是，这条规则的作用半径极小，to be中的e，leaf中的ea，siege中的ie，key中的



ey，seize 中的 ei 都读作长音 i。

如果某个构词规则的作用半径不能“说明整个圆面积”，那么具有这种规则的语言可以叫作“非逻辑”语言。活的语言都有一种特性(对初学者来说是捉摸不住的特性)，即不按俗套来构成新词。“非逻辑”就象“非语音”一样，当然只是表面现象。无论何人，只要他愿意深入到语言史中去研究断代（即现代的横切面）规则和历代（即历史形成的）规则，他立刻会明白，不存在什么例外，各种规则的作用半径是极大的，而规则本身的数量是极少的。但如果理论使我们感到厌烦或由于客观原因而不明白，那么，举例来说，学习匈牙利语时只需要记住：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用后缀 -tat、-tet 来构成“使…”的动作（在属于印欧语系乌格尔-芬兰语族的匈牙利语中，“纯粹的”动词作为一种词类是不存在的）。olvas（读）可以构成 olvastat（使…读），但 ir（写）却不能构成 irtat(使…写)，也就是说不能使用同一个后缀。这个后缀有一个历史性的对偶：-at，-it，其意义相同，词根也相同（这是不难看

出的），但正如语言学家们已指出的，已经变成非能产型的了（即不能以此类推到别的词上）。这种现象在其它语言中也能看到。例如，俄语中动词изобретать（发明）可以构成名词изобретатель（发明者），但动词открывать（发现）加上那个后缀构成открыватель（发现者），就有点不妥了。

如果一个词不能纳入形态学的规则，或更确切地说，如果这些规则同母语中的规则在意义上或形式上没有相似之处，那么，这种词或词组我们叫做“外来语的词”（-изм），如，法语式的词（галлицизм），英语式的词（англицизм），俄语式的词（русизм）。换句话说，这些词和词组的意义不同于其构成部分的意义。匈牙利语中这种“乌格尔语式的词”也相当多，如kivan a lóból（出马＝打扮得过分惹人注目），üsse kö！（石头砸他！＝好，同意，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等等。

这些“外来语的词”能增添语言的美，能说明人民生活、性格、历史中的许多东西。它们有时很有意思，有时很难。它们还会使人产生许多误会，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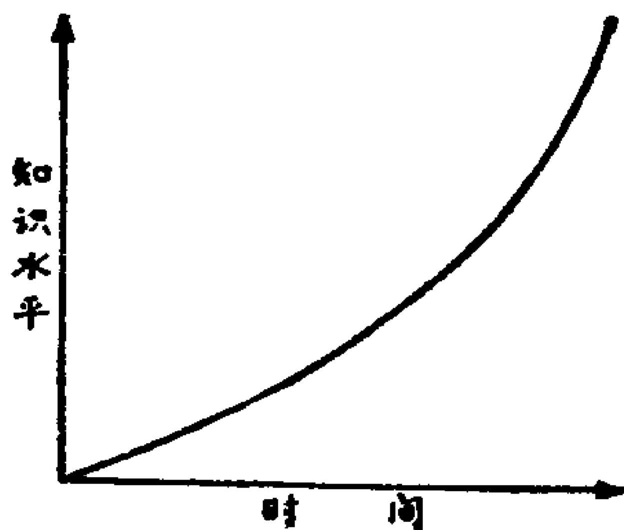
往是可笑的误会！

我有一个翻译同行很喜欢俄语的成语 скатертью дорога（滚蛋），也不知他是从哪本书中学会的。从构成这个成语的各词词义来看，这位同行认为大概是很美的、很形象的祝愿，祝人一路顺风，平安到达，旅途愉快，于是在给一位苏联贵宾送行时，他丝毫也没感到有什么问题就“试用”了这个成语。可以想象其后果：不仅没听到衷心的感谢，还不得不做了解释……

我们再回到意大利语上来。也许可以说，它之所以获得“容易的语言”这个光荣，是因为它的读音规则、发音、构词和造句都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半径。在匈牙利，还因为我们通常在中学毕业后就接触意大利语。只要是文科中学，那里的必修语种之一就是法语或拉丁语，而拉丁语是一切罗马语的祖先，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很相近，意大利语又同西班牙语一样比其它罗马语更接近于拉丁语。如果一个人既不懂拉丁语，又不懂另外一种罗马语，而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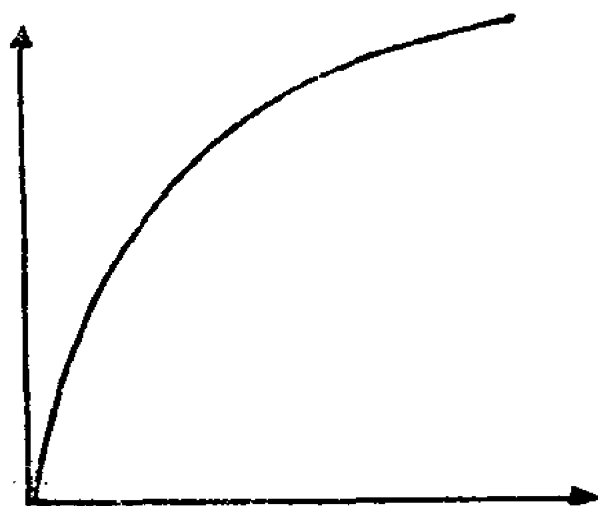
学习意大利语，那他不会比学习任何其它语言感到容易。

那些用非拉丁字母书写的语言通常被认为是困难的语言。谁只要掌握一种这样的语言，就会说这种困难是明显地被夸张了。何况掌握字母表（实质上是学习一套新的数量有限的图画）只是学习语言的第一阶段，而且是相对短促的阶段。假如我们学习俄语或阿拉伯语，那么前进的曲线大致将是这样的：



开始困难，然后是均衡的、有信心的提高。

而对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这样的“容易的”语言来说，则曲线将是相反的：



开始时高兴地感到进展迅速，但越往后就看得越清楚：许多词和规则还没掌握。当然，这种词和规则比上面提到的“困难的”语言要相对地少一些，但我们应当用它们来表达和理解——更主要的是来区分——物体和实际现象之间全部丰富的关系、人类感情和思想的一切意味。这就要寻找一些方法（已经是实际的方法），使同一些规则表达极多样的现象。“英语多容易，是不是？”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我总是回答：“是的，头十年很容易，然后就难得要命。”

如果说使用象形文字的语言较难学（你们大概已能理解，难易是极其主观的概念），那完全不是因

为象形文字本身难学！所有这些符号都有铁一般的图表形象逻辑，学习它们会带来愉快，而愉快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动力。不，我认为，要学会日语或汉语之所以需要多三倍的时间，完全是由于其它方面的原因。有字母表的语言，读音规则很容易掌握。掌握了之后，就只须在词典中找出生词的意思（有时连这都不需要，因为意思可以从上下文中猜测，或是从已知的词根中猜出）。至于象形文字，就首先要弄清楚怎么念，然后才能找到它的意义。

但“有所失必有所得”的规律对这些语言也适用。例如，Eiche, Birke, Linde 这三个德语词，读音是毫不困难的，但从外形看就看不出这三个词都表示“树”（橡树，桦树，菩提树）。可是日语和汉语中，只要学一天就一眼可以看出方块字表示的是某种树。

有一次，我的一个同行写信给我说，英语也是象汉语、日语、朝鲜语这样的象形文字语言，因为看着英语词判断不出它如何读，手头离不开一本语音词典。

让我们再回到“丰富的”和“贫乏的”语言这种奇谈怪论上来。不能否认，在某一种语言中，表示某些概念的同义词可能多些（顺便说一句，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研究过语言的同义比较，还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材料谈到语言学的这一问题）。有时候，在某些语言中有大量的同义词表示某一个概念，而在同一语言中描写其它现象的词却惊人地贫乏与单调。我们的母语——匈牙利语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文学翻译家经常抱怨不能把原文的一切意味都用本族语表达出来。当然罗，德语的 Stimme（声），Ton（调），Laut（音）译成匈牙利语都是一个词 hang，这也没有什么可悲的。这种“不足”可以靠词的景致描述或补充定语来补偿。这条翻译规则就是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的所谓补偿法。英语的 seed（种子），nucleus（核），pip（谷粒），core（果核），semen（精子）译成匈牙利语都是 mag，而 kernel（核），grain（颗粒），stone（果核）则有时也译成 mag。可是，哪一种语言里能区分 fejlödés 和 fejlesztés 呢？（俄语中这两个词都译作 развитие〔发展〕，但前

者是“发展”本身，后者则是“谁去发展什么东西”。）或者能区分 felhalmozás 和 felhalmozódás 呢？（前者是“堆积”，有人把东西堆积起来，后者则是“堆积”本身。）

德语经常被誉为“丰富的”语言。虽然如此，它却没有专门的词来表示“会”和“能”，说得确切点是来区分这两个概念；只有一个词 können，既表示“会”，又表示“能”。当然，正象法语、俄语、波兰语中有区分这些概念的词（如 je sais écrire，умею писать，umiem pisai（我会写）和相应的 je peux écrire，могу писать，mogę pisai（我能写））一样，也不足以说明问题。法语中 savoir 和 pouvoir，意义不同，这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说法：si jeunesse savait，si vieillesse pouvait（啊，如果青春有知，老年有能）。

要表示一种取决于允许与否的可能性，英语中有专门的动词 may。它启发了聪明的肖伯纳回答一个不大高明的翻译的请求，后者请求这位大剧作家允许翻译他的一个剧本，肖伯纳回答道：《You may，

but you can't》。用匈牙利语（俄语也一样）就只能译成粗暴的“您可以翻，但您翻译不了”了。

上面讲到的辅助动词，使我想到我们今天经常谈论到的一种语言——青年的语言，想到青年人常用的一些特有词语。有人责骂青年，有人则对这种语言的表达力和创造性感到惊奇。我是属于后者的……

我国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翻译家克拉拉·肖洛丝有一次说起，她翻译托马斯·马恩的小说《魔山》时，有一句话使她费了不少事。马恩写道，多么遗憾，一切感情，从最崇高的精神状况到肉体的欲望，都不得不用唯一的一个词 Liebe（爱）来表示。译成匈牙利语后，这种遗憾就失去意义了（如果不附上德语原词），因为匈语中表示精神的爱（对祖国、母亲、亲人、朋友等）和对女人的生理上的欲望有两个不同的词，尽管是同根：szeretet 和szerelem。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优秀的翻译家束手无策了。

词汇量与上下文

“妈妈，tb是什么意思？”

“要看你读的是什么，孩子，也许是 tiszteletbeli（名誉的〔会员〕）。如果是体育报，可能是 Testnerelesi Bizottság（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医学论文里则表示“肺结核”。在历史学的论文里也有可能表示 táblabíró（上诉法院的法官）。”

这个例子看来可能有点极端，但生活中却实有其事。由此可见，词和各种简写词都不能脱离它们同其它词的联系来理解，只能在上下文中理解和学会。

“上下文”这个词我们经常用，既用其直义，也用其转义。但可能很少知道它的词源。拉丁语 contextum 的意思是“编织的”。懂得这个本义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任何一段话，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实质上都是一种编织。可以从中抽出一个词

或短语来，但这种孤零零的词或短语同整体的关系就象一个环节同整个链条的关系，或是一根线同绣出的图案的关系一样。线条编织起来，互相映衬，共同构成和谐的色彩、形式，构成牢固的织品。

也许，每个哪怕只学过一种外语的人都能体会到，多年来第一次不得不用这种外语讲话时有什么感觉。脑子紧张地活动，最后懊恼地摊开双手：学过，记过，但忘了。最简单的词都想不起来了。我觉得，它们不是被本族语中相应的词挤掉的，而是被您现在正在使用（读和说）的另一种语言中的词挤掉的。您对自己的记忆力生气，也感到奇怪："您看，明明记住的，怎么会忘了！"可是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这些词开始慢慢地恢复起来，在记忆的仓库里睡了几年大觉的名词浮现了，它们的修饰语和变好了位的动词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您的话使对方惊奇，您自己则暗自高兴："暂时离老化还远得很，我好象还不是刚才自己骂自己那样的笨蛋。"原因在于：平时不大意识到的，但却是人类感受能力所固有的一种过程——联想过程开始了。通过一定

的意义联系，一定的语法形式联系，也就是在上下文中理解、掌握的词语开始发挥引力作用，好象自然而然地各就各位了。

我经常苦苦思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什么一个人记忆姓名的能力特别弱？生活上的或专业上的概念（词）即使多年不用，有时也能招之即来，而人名，熟人的、朋友的、亲戚的名字，有时简直不知道掉进哪个深渊里去了。如果上了岁数，记忆力不好使了，那么首先不听使唤的就是对姓名的记忆。托马斯·马恩曾写过一个女主人公，说她的年龄正处于“记忆力还旺盛，但对人名的记忆已经生锈了”的时期。

我觉得，这种现象可以用上下文的概念来解释。单词不用去寻找，是因为它们在记忆中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逻辑上与一定的结构、现象、形象、情节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而人与人名之间则没有这种上下文联系，可以使人“一下子”想起来：隔壁的小姑娘名叫夏娃，昨天在公共汽车上扑到我怀中的老同学叫玛丽亚·科瓦奇，电话里那个熟悉得要命

的声音，是几年不见而突然出现的老朋友拉奥什·巴尔特的。

不只一次碰到过由于忘掉熟人名字而处于尴尬局面的人，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窍门：谈话时避免称呼，而使用“亲爱的”这样半开玩笑半嘲弄的说法，或者象现代青年人那样不拘礼节地叫“老头儿，老太太”，再不就是想法把话头引到使对方自己说出名字来。

我倒想建议一种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的办法。这个本来纯属交际上用的办法，倒可能成为学习外语单词的方法。我强调一下：仅仅是一般的方法。我指的是所谓“联记法”，它实际上就是建立人为的上下文。不要让单词或人名悬在真空里，要把它们同另一个已知的词或概念联系起来，不一定要找出意义上的联系，只要形式上相似就足以记住了。我就忘不了日语的“穷人”和意大利语的“男孩”，因为二者都叫 bimbo。

当然，这种形式上的联系不是没有危险的。里哈尔德·卡茨在一本书中写过：日语的“谢谢”（阿

里加托)，他是靠 Alligator(短吻鳄)来记住的，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他对一个帮他穿大衣的、可爱的日本艺妓说了声“鳄鱼”。

构成上下文的不仅是言语的词汇成分，也包括伴随着言语的一切东西：面部表情，语调，手势。因此，我们对活生生的、靠手势比比划划的交谈者，比对看不见的广播员（其语音有时无可指责）理解得更好一些。我的实践中有过一次危急的情况，其救命的上下文竟是说话人的肤色。那是一次国际会议，我担任同声传译。要说明的是，有些同声传译工作者（包括我在内）有闭着眼睛翻译的习惯。好在谁也看不见，因为同声传译一般都在紧闭着的小屋内进行的。这样闭着眼睛能使精神更加集中，消除一切分散注意力的“视觉”印象。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了一句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话。我尽管当时只紧张地关心一件事，即“千万不要拉下三、四个词”，但还是感到这句话带有种族歧视的涵义。这时，听到有人用法语说了一句极其生动而简练的回答。当时我没听清一个最重要的词，即回答者认为那句话

是 acceptable（可以接受的）还是 inacceptable（不能接受的）。可能出于害怕，我睁开了眼睛，往小窗外看了一眼，得救了：作答的发言人的黝黑的非洲人肤色消除了我的任何疑虑。

但“上下文”这位老师的作用，并不是在有误解或记忆出毛病时出来维持秩序，而是帮助我们获得必需的知识。

我还要回到词汇量上来。因为这是我们的语言知识中最具体、最“摸得着”的那部分。词汇常常使用，因而人们把词汇量同掌握语言等同起来，把词汇记忆同语言熟巧等同起来，其实是两码事。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自豪的父亲说，他的女儿在学德语，而且已经“掌握了一半德语”。什么叫“一半”德语？很简单，她已经记住约 1500 个词了，再学会 1500 个词就能流利地说德语了。

还有一种比这还天真的说法，也是关于德语的，我是听一个小同行说的。他大概只有七、八岁，同妈妈一起坐电车，嘴里不停地说：

“妈妈，明天我们有德语课。”

做妈妈的大概在想着别的事，对这件大事只是点了点头。小男孩失望地住了嘴。但他很关心这件事，过了一、二分钟又扯了扯妈妈：

"妈妈，是不是上完德语课我就会讲德语了？"

不，很遗憾，这位小热心家上完课还讲不了德语。就是过一周、过一个月之后，还讲不了德语。等他学会那三千个最低词汇量之后，他也不能掌握德语。

按照杜拉·拉齐乌斯的说法，语言的词汇是个汪洋大海，而且依靠它本身的构词能力和同其它语言日益扩大的接触，词汇量在不断扩大。

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想到要掌握一门新的语言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掌握一部分词汇了。仅仅在一小段音乐评论文章中，我就找出了十四个意大利词，虽然文章是用匈牙利语写的。在足球迷们看完一场比赛后的争论中，可以说完全用的是英语。俄语词спутник（卫星）已经进入了许多种语言。甚至在日语这样的冷门语言中，我们也能找到许多已经进入其它种语言的词，如kimono（和服），

taifun（台风），geisha（艺妓），harakiri（切腹自杀）……

很大一部分地理概念和极大部分的科学概念，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是国际词汇，而所有欧洲语言中的航海术语都是来自荷兰语。

各种语言都汲取了数以千计的外来词语，但给了它们以自己的“国籍”，纳入自己的语法变化体系。这些外来词语中有些已经被完全同化了，有时连语言学家都难以辨认。例如，匈牙利语汲取了大量斯拉夫语中同定居生活和农业有关的词，因为马扎尔人在公元第一千年的中叶民族大迁徙时代停止了游牧生活方式，在斯拉夫民族所生活的喀尔巴阡盆地定居了下来。匈牙利语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词汇，如ebèd（午饭），villa（叉子），vacsora（晚饭），mezsde（田界），kormány（政府），等等。

我有一个朋友跟人打赌，他编了一段英语文字，其中所有的词都来自希腊语或拉丁语，内容是医学方面的。他向医生们宣读了一遍。这些医生不懂英语，但懂拉丁语和少量希腊语，可是谁也没听懂。

这不奇怪！的确，由于英语的读音规则，已经很难认出 izofiogs 就是 aesophgus，而 saiki 就是 psyche，fits 就是 foetus。法语的 nature morte（静物写生）和 chef d'oeuvre（杰作）这两个词，对学习法语的俄罗斯人来说，也只有知道它们的词源时才能理解。

如果外语文字清楚，理解借用词，或更确切地说是认出借用词，毕竟不是个问题。如果谈论的是高级物质，理解借用词也不成问题。但越是接近于日常琐事，这种借用词汇就越民族化。这就没有办法，只好去学会它。没有线是织不成布的。

怎样学单词？

普遍采用的学单词方法是：在笔记本的左侧写上一行外文词，右侧写上相应的母语，用手掌轮流遮住左侧或右侧，眼睛看着，嘴唇动着，——就这样去记生词。这是老方法了，跟学外语这事本身一样地老。这种方法有它的优点，但也有较大的缺点，

那就是单词是脱离上下文来记忆的。唯一的联系是母语中相应的词义；我们仅仅是和它“挂上钩”，说得科学些是仅仅同它发生联想。这种作法很不理想。首先是因为一般这样只能掌握一个词义。如果“生词表”上写着英语的 marble 是“大理石”，这只是半个真理，因为它还表示“筹码”。严肃的、内容广泛而充实的词典经常把一个词放在十五个、二十个搭配中来解释，就这样往往还不能解释完这个词所有的用法。这不是因为词典不好，而是因为不可能有一本词典能列出词的所有“等价物”，描写出它的一切用法，举出它的一切能搭配的词。

但这种方法毕竟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单词表是我们自己编制的，每写上一个词都同我们的某项活动、某种印象有关联。我们把词写到本子上时，实际上就是写到“自我”这个上下文中去，必要时就易于回想起来：在什么情况下我碰到这个词，什么时间，这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甚至写这个词时的情绪怎样，等等。

因此，我诚心诚意地建议大家编写一本不按字

母表排列的生词表。用同一种笔迹写的一行接一行的词可以比做一片大沙漠，每到一处新地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可是，只要一变换字迹，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每一组新词用一种图形，就立即会产生“支点”。换句话说，这种单词表的优点，就是我们能够把个人的独特标志写在里边。

另一种方法可以叫作“词典法”。拥护这一方法的人可能个性极不相同。这里说的是直接从词典中学习词汇。

现代的词典都是把词放在它的基本意义群里来解释的。很可能正因如此，“词典法”虽然违反外语教学法的基本原理，但却在实践中证明有效。我早就在寻找能解释其所以有效的原因。我详细问过我认识的一个中学生，他在去德国旅游前先把一本袖珍词典“抠”了一遍，在德国期间德语说得挺不错。他告诉我说，他建立联想的基础是词的头几个字母。他把词的所有词义都放在一起学，一组一组地学，于是词组就向他展示了语言的内部逻辑。

词典的逻辑上的优越性同单词表的个性特点可

以结合起来，即在笔记本上不是写孤立的词，而是把它同其它词结合起来，首先是同课文中的其它词一起，同时写上意义相近的词（同义词）或意义相反的词（反义词）。但也不可过分，要只写那些真正非写不可的。不应忘记词的可贵的特点，即能产生一整套词的家族，有时成员众多，而且还能组成词的“社团”。

猴子是最有组织的动物（当然，除人外），因为它能同样成功地使用四肢。而人之所以能在动物中成为万物之主，除了其它原因外，是因为他学会了用两只手来干活，也就是实现了有理性的活动。所以，一切语言中，“手”这个词能派生出最广泛的词族，这是不足为奇的。一位德国学者断言，可以用由“手”派生出来的词来描绘人类活动的一切变体。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但我收集了一小组法语词，里面“手”字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它们的构成：

装模作样的——maniéré

重新制作——remanier

手铐——menotte

独手的，企鹅——manchot

解放——émancipation

支持——maintenir

劳力——main d'oeuvre

刀柄——manivelle

服侍——manutention

生产，制作——manufacture

利用，掌握——manier

袖口，旁注，标题——manchette

教科书——manuel

手稿——manuscrit

宣言——manifeste

示威游行，表达思想感情——manifestation

驯马——manége

蹒跚的（步伐）——démanché

命令，全权，证书——mandat

管理，操纵——manipulation

暖手筒——manchon

现在——maintenant

方法，方式——maniére

袖子——manche

委任人——mandant

阴谋，诡计——manigance

性格柔和——mansuétude

等等。

可能，读者也知道，有的词容易记住，有的词不知为什么难记。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我们在母语中常用的词就好记。一般说来，凡一个公式、一个数字、一个名称、一件事同我们的生活关系越密切，我们就记得越牢靠。我要再谈谈在这本书里不止一次讲过的意见：经过某种努力获得的知识，比现成得到的要牢固得多。如果我们从上下文中猜出词义，这会给我们带来“合乎逻辑的喜悦”，正常的兴奋。我想援引一下巴甫洛夫的学说，不过说得稍为原始一点：如果意识的和情感的范围同时对刺激物作出反应，其效果将更加牢固。用生理学的语言来说，任何刺激物都产生两种刺激，它们互相加强，从而产生巨大的

效果。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上的，在于词本身，词的内容。表示某种具体物件的名词（屋子、窗、书、铅笔）最容易记，其次是表示能感受到的特征(颜色、形状、大小）的形容词（蓝色的、圆的、浅的)，然后是抽象名词，再往后是表示不难想象的具体动作的动词（跑、交给、拿着)。经验证明，最难记的是表示抽象动作的词（执行、保证、援引)。

这里，动词排在最后，因为它们是变化最大的词类。它们很少用于原形。我们接触它们时，一会儿是现在时，一会儿是过去时；一会儿是单数，一会儿是复数；一会儿是消极态，一会儿是积极态；一会儿是陈述式，一会儿是假定式，一会儿是命令式。俄语动词的体（完成体和未完成体）多么麻烦啊！还有匈牙利语中客体的与无客体的后缀有各种时间、人称、式！

词的好记与否，除了词义，还取决于形式。但不是通常理解的那样简单："词越长越难记"。长词难记，是因为字母越多，就越可能同已掌握的或由

于某种原因已记住的词在字母或语音上吻合，这就发生“交叉联想”，使我们把词弄混。这条规律不仅涉及一种语言（不一定是外语，在掌握母语的新专业或新题材的术语时也可能发生这种现象），而且涉及几种语言的接合。

譬如说，俄语中我最感困难的是这些动词：применять（运用），принимать（接受），прибирать（收拾），примирять（使讲和），它们的发音太接近了。

许多教育家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在教材中把这一类的词隔得远些，以避免这种危险。我却认为相反，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其实也不止我一个人如此认为），就象学同音词（书写和发音都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时把它们放在一起一样。日语的 okiru, okoru, okuru 这三个动词加在一起有十个意义：起身、醒来、到来、突出、发怒、实现、赶出、赠送、调离、伴陪。好几个月我都竭力想把它们作为互不相同的词来掌握，不是放在一起学，而是尽可能分开学，但什么结果也没有，总是弄混。我一生气把它

们放在一起，编成各种结构来学，结果却很好。

词与词除了有难掌握和容易掌握的区别之外，当然还有重要性的不同。“请”这个词比“大”要常用十倍，“大”又比“可见性”常用百倍，最后那个词又比orangutan (一种猩猩名——译者注)常用万倍。(这里的数字当然是随意写的，我并没有去统计。)但最经常重复的大概是“对不起，我没听清”，或“你刚才怎么说的来着?”这是别人用外语跟我们说话时我们最先会说的话。从逻辑上说来，一切教科书好象都应从这几句话开始。但我还没见过有一个教师教初学者时是从这几个救命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词语开始的。

我想建议一种把词的重要性考虑在内的学习词汇的先后顺序。但在此之前，再次援引一下把语言比作有四间屋子的房子这一比喻。如果我们自觉地把学习语言的目的加以限制(例如，只是想培养笔译熟巧)，那么，只有经常象主人那样走遍四间屋子，才能真正懂得语言。这四间屋子是：

1. 听懂口头语；　　　　2. 读懂书面语；

3. 口头能说；　　　　4. 笔头能写。

要想把第三间“屋子”“摆设一下”，就立即需要下列词语：

帮助建立联系的词：“怎么？”“您怎么说来着？”“谢谢”，“请原谅”，“再见”，“您好吗？”“劳驾”，“是”，“不”。

现成的公式：“我是匈牙利人（俄罗斯人，德国人，英国人……）”，“我不会说俄语（匈语，德语，英语……）”，“您会说……语吗？”“劳驾，请慢些”，“请问，哪儿是……”。

代词：“这”，“那”，“谁”，“什么”，“我们”，“他们”，“谁的？”“我的”，“他的”，“他们的”，等等。

表示地点、方向、时间、顺序、数量的词：“哪里？”“这里”，“那里”，“向左”，“向右”，“已经”，“还”，“什么时候？”“现在”，“过一会儿”，“多少？”“许多”，“少量”，“更多”。

动词“是”、“能”的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

数词：1 至 10 和 10 至 100。

确定时间的词语：“几点钟？”“今天”，“昨天”，

“明天”，星期，月份。

十五个左右最重要的动词和助动词，如：“知道”，“要”，“走”，“来”，“找”，“找到”，“等待”，“出发”，“到达”，“开始”，“吃”，“喝”，“去”，“坐下”，等等。

名词（是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其重要性的顺序决定于说话者的兴趣）。

某些修饰语：“大的”，“小的”，“另外的”，“便宜的”，“贵的”，等等。

表示基本颜色的词（共七个）。

帮忙词语（它们能帮你赢得时间来考虑下面如何说话），如：“问题在于……”，“我想说的是……”，“我想问问，打听一下……”。

如果话题是“学习语言”，则还有下列词语：“语言很难”，“我刚开始学这门语言”，“我是自修的”，“可惜我实践的机会很少”，“学校里学过，但多年没有用了”，等等。

旧教科书“名词化”的毛病很突出，即名词过分集中。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名词这个词类在学

习词汇的过程中最容易掌握。在本世纪初出版的"奥伦道夫"教科书中，可以说没有一句话不是由三级领属格结构组成的（如："邻近庄园的偷猎者的纯种马"——光是这句话则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掌握流利的口语来说，所谓"装饰词"就更为重要。我把它们叫"填充词"，因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充实语句而不改变其意思。这样的词如："足够"，"显然"，"很"，"当然"，"总之"，"确实"，"也"，"主要"，"肯定"，"更"，"远为"，"毕竟"，等等。要掌握它们并不容易，因为它们无法具体想象。但我仍然建议初学时就要注意学习这些词。

也不能忘记这样一类"短语"，它们大都是插入到句子中的，不是语言的砖瓦，而是现成的板件。它们可以放在手边，需要时可以"安装"上去。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使你赢得时间来回忆忘掉的词语，或更正确地组词造句。

我已经说过，成年人与儿童不同，他们不愿逐词转述课文。这往往是因为已经理解的东西就不再能引起兴趣。"装饰"结构有助于更灵活地理解和转

述读过的材料，有助于变换复合句的构成。因此，应该编写一个包含这种结构的一览表，并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我给每种语言都编了这样的一览表，而且不断地加以补充。这种短语的来源不仅是书本，而且也来自同使用“我的”语言的人的交往。这一类的短语如：

情况是这样的……
我想强调的是……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
我是否可以问一下……
但同时……
我当然知道……
这当然也对……
更何况……
可是不应忘记……
上述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下列事实……
等等。

最懂得这些插入句的用处的是翻译人员，首先是同声传译人员。他们牢记本职业的头条戒律："永远不要沉默"，因为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形——忘掉一个词，或是没听清，在紧张的翻译中（或是情况不允许）又不能反问一声；要不停顿地翻译（沉默总会给人以不好的印象，而且会引起不信任），同时又要使句子尽量完整，尽量美。这就难怪英国人把这一类的"装饰语"叫做 Lubricant（滑润剂）！

但是，亲爱的读者们，不要害怕，这只是一些建议，而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也许，有的人并不需要这样的滑润剂，他已经学会了不用它们也能讲得流利（也译得流利）。再说，建议和方法已经多得能使人迷路了。你们最终会挑选到你们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方法。

是拐杖还是辅助手段？

阿纳托里·弗朗士把词典称做"按字母表排列

的宇宙”。我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拿起词典来还是很有感受。

我们翻译是最幸运的人。只要一抬手，一秒钟之内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想知道的词。可是在其它知识领域里，譬如核子物理学，要想对某一问题求得答案，需要多少实验、争论和长时间的思考啊！

词典是能够在多年内满足我们对知识的渴望的工具。它值得我们用哪怕几页的篇幅来谈谈它的成千上万个词。

我想对读者们提的希望是：第一，希望词典永远不离开您；第二，希望您随时都能离开词典。

词典是打开语言之锁的最好钥匙。必须买一本，而且把它翻弄到破烂不堪的地步。英语的well-thumbed（常被翻阅的）一词很好地刻划出了书的这种状况，即它的主人已经彻底地利用了它的全部有用之处。

及时学会查词典，是最首要的任务。我从一开始就给那些学习象形文字语言的人一本词典，以后再象从学习其它语言的人的手中一样拿掉它。

在学习的最初阶段，甚至在学前阶段，词典能促进思维。但此后它就开始走向反面，使您不会思考。可惜由于人类意识的惰性作用，我们常常用词典来代替思维。用词典简单容易，因而也会发展惰性：反正词典就在手边，何必去伤脑筋！

但是，不动脑筋，就谈不上学习。学习语言的初级阶段，词典能推动我们付出精力，但后来就会把我们推上一条任人摆布的道路。

在阅读书籍，记听课笔记，表达某一思想或翻译的时候，某个需要的词语一时想不起来或者对其意义没有把握，怎么办？不去查词典吗？不，当然要查……但是，要“会”查！

“绷带”这个词英语怎么说？我们的手会自然而然地伸向匈英词典（俄英词典，等等），熟练地一页页翻着，然后……懊恼地一拍前额：“啊，当然是ribbon！”可是马上就会忘记掉。

如果自己先冥思苦想，哪怕想出语音上相近的音节（bir……不对；ri……，ribb……）；如果费点劲打开倒译词典（英匈词典、英俄词典等），检验一

下我们回忆得对不对，结果愉快地发现是对的，这时愉快的火花和对自己的称赞（称赞自己有耐性，有顽强精神，有好记忆力）会使这个词牢牢地印在记忆里。虽然付出双倍的时间，但会得到十倍的效果。

很多人认为，成功感是教育学甚至是全部生活的关键问题。你们通过别的例子会有类似的感觉，说明这并非毫无根据。而在语言学习中当然也是如此。

学习语言的最初阶段就可以用所谓单语词典或详解词典。举例说，俄语词典有 Даль, Ушаков, Ожегов 的，法语有 Larousse，西班牙语 VOX 或者 Peal Academia Española，英语 Oxford，德语 Duden。“付出的精力多，效果就好。”这个原则的正确性在这里得到更有力的证明。

假设下，我们忘记了或者头一次想知道“准确的”这个词德语怎么说。有一个德语的外来词 exakt 在脑中转，但应该有（或记得有）一个更好的德语词。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去查详解词典，看看那里对 exakt 的解释。用这个办法找出来的 ge-

nau,比立刻查双语词典记得要牢固十倍。

现代词典已不仅仅用一些基本词义来“反映宇宙”了。附有丰富的词汇搭配和典型例句的词条是完全“值得一读”的。

词义及其使用规则在词典中是与其它词联系在一起列出的。

一本好词典是一座宝库。词典里，不是孤立地而是通过各种上下文给词的。这使我们有可能想出更多新的形式来巩固记忆。同一个词在各种不同的搭配里出现多少次,它在我们意识里就反映多少次。词所在的句子是学习这个词的良好的意义模式。没有注明用法的词不是词，而是字母和音的堆积。但另一方面，不要把词义放在环境描述很完整的文里来记,因为这样要记的东西太多,不会有什么效果。这样的劳动或是太机械，或是负担太重，以致时间和耐心都会不够。

因此，请注意词典里提供的用词的模式。可以把它们抄在单词本里，一定要记下词的支配关系，即前置词、后缀、词尾，只有通过它们，这个词(动

词、名词、形容词等）才能和别的词连起来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给这些模式补充一两个其它词。

关于教科书

近十五——二十年来，这方面的成绩不小。有许多以最先进的教学法原则为基础编写的教科书，可以用来学习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我想用黑体字来强调，每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应当用**自己同胞**所编写的教科书来学习外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民族的代表学习同一外语时所遇到的困难各异。著名的丹麦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学法家叶斯佩森曾经按民族列出学习英语中的错误。

请允许我也来举个例子说明有些现象对一种民族讲是难题，而对另一民族却是理所当然的。解放后传入匈牙利的第一本俄语教科书，是波塔波娃所编的。读这本书时我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我们匈牙

利人说来相当自然的问题，书中却用了很多篇幅来加以解释，而对我们的难点则三言两语一带而过。譬如翻译俄语中 где 和 куда 的困难，在波塔波娃教科书中一再提起。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地解释这个问题。匈牙利语中 где 与 куда 的译法和用法，同俄语完全一样。猜来猜去，后来才弄清楚，原来这本教科书是为法国人编写的，不过被我们译成匈牙利语而已。而在法语里，却没有与 где 和 куда 相应的词，二者都译成一个词 où，因此为法国人编写的教科书里，当然要对这一语言现象予以重视。

目前中学，乃至大学教学中颇为盛行的，是使用所学语言国家的小学基础教材。我认为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当然，每个学习语言的成年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儿童。但是，所学语言国家的六、七岁的儿童，仅仅不知道单词的写法而已。他的词汇量（当然，首先是消极词汇量）接近于周围的成年人的生活词汇量。让那些学习匈牙利语的波兰人、俄国人、法国人怎么学匈牙利的小学阅读课本呢？第

一句话是："牧猪人拿起号角，于是响起了滴滴的颤音。"

我们怎样说外语？

我们说外语，用的是已知的类似语言现象，其中一部分取自母语，一部分取自所学外语中已经牢固掌握了的知识。如果这一语言不是第一外语，则也取自以前学过的其它外语。

语言环境提出的问题，我们往往力求用我们所熟悉的另一种语言的材料（规则，类似现象）去解决，或者力求运用所学语言的已掌握的一套"模式"去解决。归结起来，可以说，我们或者依靠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或者依靠语言内部的相似之处。

这个说法，学者们会概括得更加简练。他们会说：对语言规则，我们不是使用外比法，就是使用内比法。

用外语说话时，我们自动地、本能地运用外比

和内比。这种本能活动使得掌握一门外语既易又难。

如果不用外比法，则每一门外语都得当作第一语言，当作母语来学习。这你们也能想象得出，显然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

同我们相比，儿童是解放牌的学生。他除了学习母语外，实际上无事可干。五岁时他头脑里已经装进大约两千个词。然后词汇量扩大的速度开始变慢。正如许多教育家指出的，这个年龄的儿童一年内只增加 300—400 词。因此，只有到十二——十四岁时，他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描述周围的事物。

至于成年人，在他开始学习外语之前，就已经对外语的内容无比丰富这一点有了概念，尽管他并非经常地、完全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有单数、复数的概念，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概念，有动作和事件的概念，有许多种表达思想的方法的概念。因而在学习外语时，这些知识在他脑子里就自动反映出来。

如果不用内比法，则每个词、每个句子都须作

为独一无二的现象来学。其实，以动词为例，只要掌握“读——阅读——读者——读过的”这种连锁关系，则其它外语（包括所有外语）里只要替换相应的环节，就会出来一个套环：

读	阅 读	读 者	读 过 的
читать	чтение	читатель	прочитанный
to read	reading	reader	read
lesen	das Lesen	der Leser	gelesen
olvas	olvasás	olvasó	olvasott
leer	lectura	lector	leido

词汇量要靠自动增补来扩大：模式有了，新的现象只要裁剪一下就行了。

有意识地运用这两种活动，即寻找语言之间的和语言内部的类似现象，使我们有可能在外语的迷宫里判明方向。如果所有的语言都遵循统一的规律而没有例外，则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统一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因为长期使用的东西总会破损，变样。一双手套如果早晨戴上它打水，

洗东西，从炉火上取滚热的东西，白天戴上它滑雪，晚上又戴在手上作装饰品看剧，而它还不走样，那就是怪事了。

语言现象就好比是戴着干各种活儿的手套。自然，它们会发生变化：走样，破损，变长，缩短，失去规整的外形。语言中变化最大的部分，就是使用得最多的那部分，即日常用语。

匈牙利的语言教学法专家们编了一本包括四十个英语常用动词（“做”、“取”、“来”、“走”、“吃”、“喝”等等）的词典。这四十个动词全部都是不规则动词。

翻译一句关于原生质蛋白分解成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句子并不难。在科技语言里，不仅单词，甚至组成句子的规则都是国际性的。只要用外比法和内比法就能取得最好的成绩。但是，如果有人要问几点钟，而把匈牙利语的句子 Hány óra van？（几个小时？）译出来可就难了。

德语里这句话说出来是“现在多晚了？”（Wie spät ist es？）；法语是“什么样的钟点？”（Quelle

heure est-il?)；英语是“时间是什么?”（What is the time?)；而瑞典语则是“钟点儿多了?”(Hur mycket är klockan?)。

学外语的人所走的道路，比掌握任何其它技能的人所走的道路更坎坷不平。前进的步子往往由于自动地外比和内比而复杂化。语言学里，这叫做类比干扰、内比干扰或交叉干扰。

打算当医生或工程师的人开始学习时，不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打破脑子里已经形成的关于未来职业的概念，因为可能给学习新教材带来困难，因为同新教材混淆不清的虚假的（从新教材角度来看是虚假的）医学或工程学知识在脑海中还没有扎根。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习以为常的记数的十进位制概念改为三进位制，那会产生什么后果！

在学习词汇、积累词汇方面，母语对我们的迷惑算是最少的了。英语里桌子不叫桌子，而叫 table，书不叫书，而叫 book，这一下子就能明白而且记住。但回答“什么东西在桌子上?”的问题时，就不能按母语的习惯说成 Book is on the table，而要根

据英语的内部规则说成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母语的干扰是众所周知的现象。教学法家很少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不正确的类推并非由于母语的干扰，而是由于第一外语或掌握得最好的其它外语的干扰造成的。

这可能是因为学习母语时没有花很大气力，而是在无意中就学会了。可是，一个成年人开始学习英语时，在掌握新材料的活动中，他的意识（反射意识）就要起作用。我们有意识地学习发辅音 p、t 要吐气的规则。我们把它练得十分纯熟。可是，学法语时又要花同样的气力来除掉吐气的习惯，而且非除掉不可，因为吐气的辅音有时会把法语词（还有匈牙利语词）歪曲得面目全非。

虽然外比法对学习外语来说有一定的坏作用，但对有经验的学生来说它也能成为宝贵的手段，即巩固的手段。这种手段必不可少，因为未经巩固的知识迟早会遗忘（请读者原谅我重复这一平凡的真理！）。

“学习”和“学会”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在于是否巩固。如果未经巩固的知识不会遗忘，那么掌握语言（其它课程也如此）的人数会等于学习语言的人数。可惜，这种事是不会有的。

如果遇到某一个词或某条规则，理解之后就放过去了，接着学下一个语言现象，则这个词或这条规则就没有变成我们的，没有变成我们得心应手的工具。要是能消极地掌握它们，见了它们能认出来，这就算不错了。

经过实践考验的巩固方法之一，就是对比。不论最现代的外语教学法如何反对它，成年人的脑子还总是要用它。我们应当自觉地掌握：德语里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不象匈牙利语中那样延长一倍；与俄语不同，波兰语里一般不用人称代词，因为动词的词尾已明确指出动作的主体。我们必须掌握：西班牙语的运动动词也同助动词 haber 搭配，不象在它的同族语（如法语、意语）中那样，只同它的成对虚词 ser 连用。还必须记住：英语里不用动词现在时表示过去开始而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而用

present perfect（现在完成式）表示；俄语与匈语不同，在表示数量的名词之后的有关名词须用第二格（кусок хлеба,一块面包）。

从新学的语言这一角度来看，同母语或另一种已掌握较好的外语进行比较是一种错误。但对于学习来讲，错误则是一种财富。因为错误能使我们自觉地进行对比，而对比则是极好的巩固方法。我再说一遍：没有巩固就学不会外语。

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是最可贵的财富。如果我能发现自己的错误，如果别人用发笑、吃惊、不懂，有时甚至用不快、生气来表明我有错误，这时巩固的辅助手段就是我的表情，我的一种不由自主的、甚至不被察觉的反应。

因此，我们不必为错误而生气和羞愧。错误是大量财富的源泉，包括语言的源泉。是的，请不要吃惊，确实是语言的源泉！象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布罗温斯语、罗马尼亚语这样一些拉丁语系的语言，正是由于拉丁语没有掌握好而形成的。当时，被罗马人征服的这些民族对认真

掌握拉丁语既无愿望，又无可能。

今天，当然不需要我们从错误中创造新的语言。但是借助错误我们可以将母语和所学语言的特点进行比较，自觉地对比正确和错误，从而更好地掌握现有的语言。

将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加以比较，我们就能避免使错误扎根。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曾多次提到的音叉应该发得纯正。因此，我不赞成钻研自己未经人改过的译文，或者背诵道听途说的句子。只有正确无误的范文才适于背诵。如果我们不断耳濡目染错误的形式，它们就会通过听觉潜入脑海，于是习惯成自然，我们就会象一个吃惯烤焦食物的人，偶尔给他正常的油煎食物吃，他会说，他不喜欢这种水煮的食物。

我们应该怎样说外语？

应该按照已知的模式来表述新的现象，出发点

不应是母语，而是外语。这个论点常被人说成“要用外语思维”。我个人不喜欢这个说法。因此请允许我下面仍然用我的“模式”。

用什么办法可以记录下来我们是用哪种语言思维的呢？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间可以去窥视一下——更不用说去影响——极其复杂的智力活动的机制呢？大概，只有在由于部分脑下皮层死亡因而部分或全部失去记忆的可悲情况下才有可能。匈牙利的一些神经生理学家描写过一件事：有一个受难者由于外伤而忘记了母语，但所学的外语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也有过这种情况：病人把母语的动词忘了，因而说话全用名词。让神经生理学家去研究思维和言语关系的复杂机制吧，去研究思维过程的外壳是词还是形式、形象吧。如果是形象，则是什么样的形象？而我们则回到我们的非科学的题目上来，尽可能养成不靠母语而靠外语来表达思想的习惯。

人们把说外语做过各式各样的比喻。这里我们把它比做照相吧。设想，我们看到一朵十分美丽的

玫瑰花，想把它拍摄下来作纪念。人所共知的是，我们不会把镜头对准每片花瓣去照，而是退到一定距离，以便在取景器里能看到物件的全貌。

把母语的词一个一个地拿出来译成外语的人，就好比一个对准物体的每个部件照相的人。再设想，摄影的对象是外语的某个句法或词法形式。大家知道，语言里最能感受到的部分是词汇。我们就从词汇开始吧。

我们说外语时，经常有一个怪物在威胁我们，它的名字叫做“我知道，就是想不起来了”。如果我们总是围着母语的某个词语转，总想把它翻译出来，就永远也不会想出来。

用实践和自我约束的办法我们能够赶走母语中的词语，并学会在记忆中再现那个正在随着这个词语溜走的词语。

我当俄语教师时，曾作过一次试验，问几个学生“五年的”这个词俄语中怎么说。我要是用匈牙利语问，他们就踌躇不决，而我要是告诉他们俄语词 план（计划），大家会立即说 пятилетний（五年

的）。这两个词是一起学的，所以一个帮助想起另一个。

如果我们把单词“一串串地”学，“一组组地”学，就能一箭双雕。一方面我们能更有把握地理解词的用法，因为上下文的联系就决定了它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给自己建立了一个辅助手段，它能帮助我们立即回忆起这一词族中任何一个容易忘掉的词。

每个潜入到词汇的汪洋大海中的人都会惊奇地发现：语言里有许多搭配固定的词组。把它们选出来学习是很重要的任务。我诚恳地建议那些认为自己记忆力不好的人这样做。

“障碍”和“排除”应一起记，“义务”和“履行”，“困难”和“克服”，“消息”和“宣布”，“角色”和“扮演”，“生活水平”和“提高”，“要求”和“满足”，“条件”和“创造”，“锁”和“开”，“墙”和“砌”或“拆”应一起学。这样成对地记单词不会徒劳：关键时刻它们会出现在照相机的取景器里。

万一成对的两个词都忘了怎么办？那您就大胆

用一个相近的词来代替。说出一个近似的（即使不确切的）词来，总比由于绞尽脑汁寻找一个"真正的"词而默不作声要好得多。

"奔驰"、"疾驰"、"急驰"——这些词在各自的场合当然比简单的"跑"更为准确。可是，如果其中的一个背叛了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哪怕不太好)来代替。要是全都忘了，那就只好用"跑"这个词拿来将就。杰若·科斯多拉尼喜欢说，讲外语永远是一种妥协。

除同义词外，有时反义词也能帮大忙。如果一时想不起"勇猛"、"英勇"、"勇敢"，那用上"不胆小"也总比不吭声好。

如果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情况又要求我们什么都知道，或者我们本来知道，但一时表达不出来，那还有一个万能的办法，即按这个词语的特征来描述一番。有一次我称赞一位翻译同行说："你在讲到那朵老远就散发着香气的小花时，听起来真富有诗意。"她回答说："别取笑我了，我不过是忘记了意大利语'紫罗兰'怎么说了。"

用外语谈话（或翻译）时，其效果不取决于当时的现实，而取决于现实的反映。对方要求获得的是准确的形象和内容，至于我们用什么语言手段，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当然，如果把本族语的词汇和句法形式机械地译成外语，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有关翻译我们已经概括地谈了很多了，这些都适用于外语谈话，因为谈话实际上也是一种翻译，不过译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而已。关于翻译的最普遍的标准可概括为："在意思上十分接近原文，在语言上又符合译文语言规范的译文，就是优秀的译文。"请允许我把这个论点用另外一个形式说出来："好的译文能产生原文（口头或笔头）所力图引起的同样的联想。"

我认为，谁能做到这点，就有权自豪。我给你们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往事。有一次，我们某部长为欢迎日本某部长举行节日宴会，我当翻译。上鱼的时候，客人看来为表示好感，就谈起他出身贫穷，十八岁以前每顿饭只靠吃蟹充饥，这就决定了他一生中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我一时不知所措，如果逐

词翻译过来，就会成为语无伦次的废话。日本无产阶级（渔民）的食品，在匈牙利却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我只好译成："十八岁以前我吃的尽是面糊糊汤！"

我是怎样学习外语的

在所有这一切半理论性的论述之后，最终还是应该谈谈我是怎样学习外语的。这也正是我这本小书的书名。那么，我是怎样着手实际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呢？我所以介绍自己的经验是希望别人在试用它之后，按照辩证法的原则提出更好的方法，那我就可以再用它来充实自己的武器库。

我们设想，我想学习阿齐尔语。这种语言当然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临时想出的，以便总结和强调我的方法的统一性。

开始我要动手去寻找一本足够厚的阿齐尔语词典。我从来不买小词典，经验（不仅仅是我的经验）

证明，小词典很快就成为无用的东西，早晚还得去寻找大词典。如果我搞不到阿齐尔—匈牙利语词典，就设法弄到阿齐尔—英语词典或阿齐尔—俄语词典，等等。

首先，我把这本词典当作教科书来使用，用它学习读音规则。每种语言中（从而也在每本词典中），都有相当多的国际词汇。词典越大，这样的国际词汇就越多。民族、国家及城市的名称（主要是那些还没被所谓的传统即习惯用法所歪曲的较小的民族、国家或城市的名称）以及“超语言”的科学术语，在我面前揭示了阿齐尔语的字母和读音之间的一切关系。（记得在一九四一年我买的俄英词典中，我首先找到的是我的名字——Екатерина〔叶卡捷琳娜〕）。

我先不学词，而只是端详它，计算字母和音的数量，量出它们的长度。我仿佛是在填写纵横字谜。当我分析读音规则的时候，词典又向我揭示了这门语言的其它秘密：我开始发现借助哪些手段一个词根可构成各种词类，动词如何变成名词，名词如何

变成形容词，形容词如何变成副词等。

这仅仅是对语言的品尝，试试口味，接触接触同语言的首次接近是为了以后同它交朋友。在学习词典的同时，或此后不久，我就买了一本阿齐尔语教科书和阿齐尔语的文学作品。因为我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也就是说我应该自己教自己，所以我买的是附有答案的教科书。这些书上有正确的答案。我一课接一课地学习，并且做全部练习。为了便于改错，我在写时都留出空当。我对照答案，把正确的答案抄写在我的错误答案上方。这样，我就能醒目地看到自己的“错误史”。

我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责骂自己，但立即又原谅了自己。(这是很重要的，请看下面的第十条戒律。)在笔记本上我总是留出相当的地方，以便在错误的、被歪曲的词或句子旁边写上五、六遍正确的词句。这样做有助于掌握正确的形式。

由于啃教科书是一种相当枯燥乏味的事，就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低于中等水平的消遣，所以我一开始就阅读阿齐尔语的剧本或小说。如果我能弄

到改写过的文本，就读这些节写本，如果弄不到，就随便找一本文学作品来读。我总是至少弄来两本东西，以便从中挑一本比较好懂的。太现代的作品，我尽量不读，因为有时连匈牙利语的意思也不明白。

这样我就着手阅读文字和内容都通俗易懂的作品。从不理解，经过部分的理解,直至全部的理解，这个过程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个令人激动的、有意义的旅程，能使人精神振奋。当我读完一本书并与它告别时，我就赞扬自己的坚毅与顽强。

读第一遍时,我摘记的仅仅是我读懂了的词汇。也就是在上下文中我能够明白其意义的那些词。当然不是孤立地摘记，而是为每个词都创造一个小小的上下文（请参看《词汇量与上下文》,《怎样学单词》等章节）。只有当我读第二遍，有时甚至在第三遍时，才摘记其余的那些生词,但也不是全部生词,而只是那些与我沾点亲的，即我在自己的母语匈牙利语中也使用的那些词汇,或者我很理解的词。(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词我们平时都使用，无庸讳言，也

不是所有的词我们都很理解。）所有摘记下来的词我都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成词丛和词群（构成词丛的材料可以在该书中或词典中找到）。

但是，所有这些还不能教会已经多次提到的四种语言技能中最重要的一种——听懂口语。仔细研究和抄写教科书之后，我在语音方面仍然没有获得足够准确的概念。因此，在一开始接触阿齐尔语时，我就花了一、两个小时来画“太空图”，打听在什么时候并用哪些波段能听到阿齐尔语的广播。

布达佩斯电台用七种语言向太空广播，莫斯科电台用七十多种语言广播，布拉格用十七种语言广播。邻国或者位置不远的国家的广播都能清楚地收听到，因此阿齐尔语的广播也一定能收听到。众所周知，新闻节目的内容是当天最重要的事件，尽管播音是根据阿齐尔居民的利益有所选择的，但总的说来，这些广播同用其它语广播的新闻节目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为了学习和检查自己的听力，我总是在同一天也收听用匈牙利语或其它我明白的语种广播的新闻节目。这样一来，我手头就有了某些类似

答案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词典的东西。如果在收听阿齐尔语广播时我遇到了生词（开始时，生词照例很多，我就在尽可能不影响听广播的情况下，尽可能把生词记下来），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并且在听完广播之后到词典中去查找这些生词。要立即查找，因为这时还能记得它的上下文。如果这个词听得不准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那么上下文在这种时候也极有用。如果在这之后你在词典上查到了这个词，那么，一种满足的感觉就会大大地报偿你所付出的劳动。

然后——不是立即动手，而是在一、两天之后——我把从广播中记下的词汇抄录在语汇表里。我主张推迟几天，是因为这样可以迫使自己回忆、复习那些即将从记忆中溜走的知识。

每周我用录音机把广播录下来一次。录音我一直保存到我已经多次用过并已掌握了当时所能掌握的一切为止。

通常我首先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语音上。经常能碰到一些我已经从书本上学到过，但由于对它的语

音外貌没有正确认识，因而不能立即认出来的词。这样就等于重新认识了它们。

当然，我也努力去寻找一位能够帮助我打好阿齐尔语基础的老师。如能找到职业的教师，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找不到，我就去结识一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一名学生或者来我国长期工作的专家。

与男教师相比，我更乐意找一名女教师，这大概是因为“女人的舌头更好”的缘故吧。和女人们交谈比较容易，也容易找到默契。（真的，这个自古以来为人熟知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从阿齐尔语老师那里我首先期待的，是无论从书本中还是从广播里都不能够得到的东西：1)可以商量放慢语速，以便听懂尽量多的词汇；2)可以在努力完成每课作业的基础上，改正我的阿齐尔语错误。

起初，我头脑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因为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往往写的只是一些用我看到过或者听到过的新单词、新语法形式构成的词组。教师的改正能使我检查自己是否正确地理解词的意义

以及这些词在句子中的作用。然后，我开始翻译。现成的文章中总会有一些并非熟知的词汇和形式，而冷酷无情的翻译又迫使你不得不去使用这些词汇和形式。同许多职业的语言教师们相反，我很同意邦戈的意见。他认为翻译（确切点说是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是最好的、最有成效的巩固知识的手段。

没有得到改正的错误是可怕的！如果一再重复错误的形式，我们就会记住它们，以后想摆脱它们就很困难。笔头翻译会象昆虫学家对待昆虫那样，把我们的错误穿在大头针上，并放到显微镜底下。而听到的东西则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从这个耳朵进从那个耳朵就出去了。

多年来，都是我领着中国的代表团参观布达佩斯。在参观日程中，总有参观英雄广场这一项。我至少说了有五十次：在广场中心一个挨着一个的花圈表示那是不知名的战士墓。这个词组我是逐词翻译的，从来没有人给我纠正过。客人们当然是没有义务教人家的。数年之后，北京寄来我所翻译的导游手册的修改稿，这时我才弄清楚，原来按照中国的

习惯应该叫无名英雄墓。

几年前，我曾在英国同一位非常可爱的有教养的翻译同行一起工作。我们刚刚认识我就立即请他为我纠正错误。过了三周，在同他分别时，我责备他连一个错误都没有给我纠正过。难道我连一个错误也没有吗？他回答说："啊，哪里，哪里，错误还真不少呢！不过，你知道吗？我们英国人已经习惯了外国人的错误，以至有了自动改错的能力，别人说的话到达我们的意识中时，已经变成正确的形式了。"

另外一件事则很有趣，而且与前面那件事刚好完全相反。一个与匈牙利友好的邻国的政府领导人，为几百名外国客人举行晚宴。遗憾的是，他用本国语言发表了隆重的祝酒词。这种语言正是我掌握得较差的。我对外交礼节的模糊认识提醒我应该把答谢词翻译成这种语言。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善良的主人，在我翻译的过程中，他常常打断我，指出我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同时还解释为什么应该这样说而不应该那样说。这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礼物。

我自己也是从不放过机会去指教那些学习我的母语即匈牙利语的人们。

我还想强调一下笔头翻译比口语优越的地方。讲外语是个习惯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因缘惯例。意思是，一个聪明人只能达到他的身材或知识所允许的高度。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糟糕的是，如果只用现有的知识来对付，来敷衍了事，那么词汇量就不会增长，句法宝库就不会更丰富。旅馆的看门人只要知道五十——六十个句子就够了，但是要对答如流。可是，一个中等学生则应该比看门人多知道几百倍。我的一位法国同行曾俏皮地说过："谈话时你是知道什么说什么，而翻译时却是需要什么你得会什么。"

那些有耐心读完我关于阿齐尔语的想法的人，也许会发现其中没有谈到两个问题。在任何一本关于如何学外语的文集中，除了上述种种之外，都会提到必须扎扎实实地了解所学语言的国家，比如说阿齐尔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等。

毫无疑问，这种了解说得客气些是丝毫无害的。它只能使我们更接近于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最大限度地深入和广泛地掌握外语。但尽管如此，尽管有这些益处，也没有必要过分地醉心于获得这些知识或向人提供这些知识。

第二点，有人会建议必须到阿齐尔去。好象没有在这个国家里的实践，就几乎不可能完美地掌握它的语言。努力争取去这个国家当然是应该的，但我并不认为出国是掌握外语的必要条件。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到了一个国家就能自动地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我们可能学会几个口头用语，二、三十个词语，但不会再多了。至少不会比我们用同样的时间在家里学到的更多。偶尔与阿齐尔人交谈，对商店的橱窗的比较和研究，一般地听人说话，都不能为我们开辟学习阿齐尔语的途径。但是，手拿词典去听人说话就能够开辟这一途径！此外，地方报纸经常刊载广告：何时何地有展览会，组织参观，或是在阿齐尔普及知识协会的地方分会里有讲演，等等。我每次出国都

努力争取到所有可以去的地方。学习语言最好的办法是去电影院。有一次到莫斯科访问，我创造了特有的记录，三周之内我去看了十七次电影。最理想的当然是经常地、密切地同兴趣相近或相同的阿齐尔人交往，特别是同那些愿意改正我们的言语错误的人们交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出国访问才对学习语言有益。

出国旅行对学习语言有无好处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我们在国外逗留时的外语知识水平。下一章中我将试图用五级分制对语言知识进行分类。对那些在语言学习方面是一分和五分的人，出国给他带来的益处是最小的。谁在出国前一无所知，回国时也将是一无所获。而对那些外语非常好的人来说，要有明显的提高也是很困难的。倒是三分的学生可能收效最明显。

我把自己在外语这个广阔天地中的漫游经验总结成为十条戒律或者说是十条建议，献给那些不是闹着玩，而是真正地想掌握外语的人们。

1. 语言要每天学。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哪怕用

十分钟也好。最好是早晨学习。

2. 如果学习的愿望很快就减弱了，不要硬学，但也不要放弃学习。要想出一种新的形式：放下书去听听广播，或把书中的练习放下，去翻一翻词典等。

3. 任何时候也不要死背，不要离开上下文去孤立地死背什么东西。

4. 要优先摘记并背诵那些用的场合最多的“现成的句子”。

5. 努力在心里暗暗地翻译一切可以翻译的东西：一闪而过的广告牌，海报上的字句，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这往往是一种休息，对已经疲劳的头脑也是一种休息。

6. 只有老师改过的东西才值得牢记，不要反复读没有经过批改的作业。由于多次读它，就会不自觉地牢记那些可能是错误的东西。如果是一个人学习，就只背诵那些肯定是正确的东西。

7. 现成的句子和成语用第一人称单数抄写并记住。例如：I am only pulling your leg（我只是逗

你玩)，或者 Ilma posē un lapin(他没有去践约)。

8. 外语是一种必须从四面八方同时向它进攻的堡垒：读报纸，听广播，看原文电影，参加外语讲座，研究教材，同操该语言的朋友通信、会晤和交谈。

9. 要敢于讲外语，不要怕可能出现错误，要请人家改正这些错误。主要的一点是：如果人家真的改正你的错误，不要灰心，不要生气。

10. 坚信自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坚信你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语言的非凡的天才。如果你觉得自己并不是这样的，那也没关系。你可以设想，你的聪明程度足够掌握象外语这样的小玩艺儿。如果还是学不进去，因而情绪低落，那么你就骂教科书。这也是对的，因为十全十美的教科书是没有的。骂词典，这也是对的，因为无所不包的词典也是不存在的。再不就骂这门语言本身，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难学的，而最难的是你的母语。这样一来，事情就会好办起来的。

我们的外语掌握得怎么样?

中学生和大学生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课堂日志或者成绩单会对这个问题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如果不喜欢这个回答，发发牢骚也就完了。

但在学习过程中只能自己依靠自己的中等学生，却是连分数也应该自己给自己打的。而由于我们对待自己通常有偏见，不是估计不足就是估计过头，因此，我就试着制订了一个总的要求表，以便使自我评价较为客观一些。

当然，我在这里是指成年人而言，而且是指努力去获得不是某种狭窄、特殊的技能，而是去获得牢固、渊博的知识的成年人。我要强调指出，这张表不是针对那些仅仅想读懂本专业的论文，或者只求能在外国商店中谈妥商品的价格与质量的人们。

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确定，我们的同行——中等学生在学习的各个阶段对所学的外语掌握得怎

么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采用了学校中的五级分制。

大家都知道，打一分和五分是最简单不过的，就象在学校里一样。毫无疑问，那些一无所知的人应该得一分。得五分的人是很少的，这些人的外语词汇量应等于他们的母语词汇量，他们的语音、拼写以及组词造句都完全符合该外语的规则，少数特定的言语变体可以例外。

以下情况应该得四分：能够识别所读的课文中的全部修辞上和意义上的细微差别；能够很好地理解作者的风格，使用词典查找课文中的单词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就不超出知识范围的题目作口头交谈时，能够使对方一听就懂，不用再问，即使在我们的口语中有不少错误；在收听广播时，有听不懂的地方确实仅仅是由于空间的干扰；对我们自己写的或翻译的文字，编辑能很好地和容易地定稿付印。

得三分的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只能慢慢地、吃力地理解他听到的东西，而且抓不住细节；当他在街上或者在商店里问什么事情时，人们总是要请他

再重复一遍所提的问题；他在说话之前总要自己先想好，用自己内部的音叉调好自己所要讲的内容；他甚至在阅读最简单的、非文艺性的作品时，也不得不求助于词典；对他翻译的文字，编辑必须对照原文才能进行校订。

最后，外语得二分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必须反复听或读多遍之后，才能马马虎虎地弄懂一篇文章；他们即使在词典里查找到全部生词，也很难弄懂书面的文章；他们用外语讲的最简单的话，别人也只有靠环境、手势、面部表情，同时还要靠善良的意志才能弄懂。

没有粉刷的屋子是可以搬进去住的，但没有盖屋顶，木工没有上门，玻璃工没有上玻璃的屋子是不能搬进去住的。

既然我们在谈话中把语言比做了房子，那么请允许我在下面继续用这个比拟。对于大家来说，建筑房屋首先要打地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所谓“零周期”有时会延续很长时间，对此无人感到惊讶。不打地基只能造纸糊的房子。但不知什么原因

很多人却认为，如果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在语言上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那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学习外语的天才，或者由于工作繁忙他们没有余力，没有可能再学外语。为什么人们总是忘了正是打基础才需要最大的精力呢？

任何一个已掌握的语言单位（不论是词还是语法规则），都是借以向更高处攀登的登山把手，或者是象本书第二节中提到的那个钉子。小彼得卡只要钉在墙上的钉子的露出部分。但是，比他年长三十——三十五岁的人们也并不都很明白：任何已获得的知识都象一个被钉得很深的钉子。大家都知道，往墙上钉衣钩之前必须在墙上钻个窟窿，然后把橛子打进去，再往橛子上钉钩子，只有这样才能往钩子上挂重东西。如果不是有人对学习语言急于求成的话，那里还值得这么详细地谈论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呢？我曾经在阿齐拉·约瑟夫大学里教过半年汉语选修课。有一个大学生很快退学了，“溜掉了”。有一次我们见面时，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整整学了一个月，努力地完成作业，但还是没学

好写方块字，连最基本的象形字也没学会写。”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评分标准上来吧。请允许我从这座需要一个好地基的复杂的建筑物中划出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语言的最容易感受到的、最具体的部分——词汇。我这里写出几个词来供消遣。请您把他们译成您所掌握的语言——对不起，说错了，应是您所学习的语言，因为彻底掌握语言是不可能的！并请您自己来评分，从词汇的角度来看，在外语学习的现阶段您应该得几分。

一	二
月亮	渣滓
买	享受
免费的	突然
广阔的	感恩的

三	四
稻草	铜
促进	拣麦穗（收割后）

古板地　　　　　　执拗地，顽强地

本质上的　　　　　精神振奋地

第一组的每一个词1分，第二组的每一个词2分，第三组的每个词3分，第四组的每个词4分。共40分。谁能得10分，他的成绩就是二分；谁能得20分，他的成绩就是三分；谁能得30分，他的成绩就是四分；40分全部得到者，其词汇成绩就是五分。禁止查词典，违者只能打一分。

学到的词汇不象我们买的细瓷雕像那样，可以摆在我们房间的某个地方，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学习外语，那么再学时，我们的大脑就会运转不灵。

大家都很清楚，知识不用就会暗淡无光。这个普通的真理是不需要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多费口舌的。但我仍然希望大家允许我再讲几句话，因为我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第一，因为一定时间的“搁置”对语言没有害处，就象“搁置”无害于好酒一样。我从许多音乐工作者那儿听说，在对作品的每个细节进行反复排练

之后，他们就把它搁置起来，几乎是一直到音乐会或比赛前都不再演奏它。据说这样的做法效果很好。在语言环境中作逗留，其效果往往在逗留期间并不明显，而是在以后才表现出来。

第二，容易钻到语言中去，但也容易感到疲劳。这种现象我和许多与外国代表团一起工作过的同行翻译们都多次碰到过。代表团到达后，翻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很正常，就象同代表团的成员们自由交谈一样。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分手时候，译员本人的脑子里除了"一路平安"，再也没有什么词了。我想说的是，就精神的紧张程度而言，自己说话和翻译别人的话是不同的。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随着翻译别人的话的速度加快，灵活性加大，词汇量增多，我们脑子中外语部分的"空白"越来越大。对这个事实，我听到过许多种解释，很难说哪一种是正确的。可能是因为客人刚到时，讲话还有些拘谨，因而说话清楚，慢而简单，过些时候，他们觉得匈牙利人对他们的言谈理解得很好，就开始象在母语环境中已经习惯了的那样去说话。这种语

体的逐渐改变，就使译员一方面能“热烈起来”，“活动开手脚”，另一方面，不再习惯于自己的正常状态，不再习惯于用那些与要翻译的词和概念完全不同的词和概念。而这时客人却一点也不拘谨了，并且开始用母语自由地进行“私人的”或与他们来访有关的专题谈话。

第三，“随着时间的流逝，未经实践应用的语言会逐渐被忘记。”这一简单的论断我们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表示语言知识发展（其实，人本身的发展也一样）的线条是一条抛物线。这个几何学的形象应该这样来理解：随着人的逐渐衰老（发展），一些旧时的回忆越来越居主要地位，青年时代所掌握的技能通常会排挤晚期所学的技能。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老爷爷能够记得五十多年前多别尔多战役的一切细节，但却忘记了半小时前自己所讲的东西。

一位优秀的匈牙利雕刻家对我讲过一件事，可以证明人们对语言的记忆也是如此。

画家非利浦·拉斯罗年青时到了英国，成了时

髦的肖像画家。他按照大资本家的定货去创作，直到一九三七年去世再也没有回过匈牙利。他与一位世袭的名门英国女士结了婚，之后就再也不去寻找自己的同胞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自然都不懂匈牙利语。如果他有时还邀请到伦敦来的同胞同行，也总是请他们原谅：他将用英语讲话，因为本族语已经完全忘记了。雕刻家继续说："有一天晚上，一位牧师唤醒了我，请我立即到画家那里去，他的夫人拉斯罗太太说他的丈夫突然病重，并且一直用她听不懂的语言说话。对他讲英语，他却不回答。我去了，但是已经晚了——菲利浦·拉斯罗已经既不能讲英语，也不能讲本族语了。本族语他只是在临死时才奇迹般地回忆了起来。"

关于学习语言的才能

直到新的卡尔曼·克维什以自己的全部威望宣布不存在什么学习语言的天才或才能之前，我们还

会一次又一次地听到类似下面的说法：

"他很轻松，语言自己会粘在他身上。"

任何东西都不会自然而然地粘住任何人，除非是强力的刺芒。学习语言的成就可用一个简单的等式表示：

所花的时间＋兴趣＝结果。

也许您会想，学习语言的才能和兴趣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如果您这样认为，那么就请检验一下自己有没有学习语言的真正兴趣。大家知道，真正的兴趣会产生无论如何也要达到目的的欲望。我个人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假如学习的成绩是有无特殊才能的问题，那么同一个学生就应同样困难地（或者同样容易地）掌握不同的语言，但是，实际上谁没有听到过（或者自己说过）类似下面这样的话呢？"我学英语的时候多不费劲呀，而现在学法语却这样费劲。""我对斯拉夫语没有语感，也弄不明白。""他懂德语又算得了什么！我也懂德语和西班牙语，但阿拉伯语我怎么也没啃动，已从头学了三次了。"……

要知道，才能是不会对不同的语言厚此薄彼的。怎么把这些说法同才能问题相提并论呢？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人（自然是指精神正常的人），他甚至连一种语言（本族语！）也不能掌握到同自己的教育水平相适应的程度。但我却听说过，有这样一位老奶奶，她最近这四十年中不但没有学过什么语言，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学过，但为了教孙女学习，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掌握了西班牙语。这位老奶奶住在伏尔加格勒。教她学西班牙语的是本书的俄译者。因此，如果在上面的等式中把“兴趣”这个词换成“目的性”，我是会同意的。“目的性”这个术语，总的来说是生物学方面的，它是指为了满足一种与生命的本能有关的需要而产生的冲动。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应当说“动机”更为确切。但这个词在语言中太多义了。因此，为了避免每次都作科学性的确切解释，请允许我还是使用“目的性”这个词，何况就其内容而言，它形象地反映了对知识的无条件的强烈追求，就象对最起码的一日三餐一样。

总之，我不喜欢“语言的才能”这种说法，因为借助这种说法，人们通常极力掩盖各种不同的概念和现象。“我没有任何语感”的这种抱怨，通常意味着说这话的人记新词很费劲，需要经过多次的尝试。“他有学语言的秉赋”，这是指那些善于自动地模仿别国的语音语调的人。至于“天才”则是说的这样的学生，他们能够正确地完成笔头作业，因为他们在语言的词法学和句法学丛林中能够找到正确的途径。“他也是个伟大的语言学家。”我们用这样的话来夸奖一个作家，如果他的风格符合匈牙利语的规范，并具有现代的创新精神。但不懂任何外语的人也可能是语言学家，只要他经过多年的细心研究，证明了在北加里多尼亚的方言中根本没有亚西利亚的借用语。

“语言家”（用我的术语）只需要三种技能：记词的好记性，会模仿各种声音（不一定是语音）和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不仅能把外语规则，也能把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联接在一起。但是，即使有了丰富的词汇、良好的发音和对语法的理解力，学

习方法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人们早就发现，出生于阿尔菲尔德地方的匈牙利人学起外语来，比北方的匈牙利人困难得多。这当然不是因为阿尔菲尔德平原和霍尔托巴底地方的人生来就都没有学语言的才能。很可能是由于在蒂萨河那边的匈牙利地区听到外语的机会，比德意志少数民族所居住的托尔尼地区，或者比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接壤的边界地区少。我是这样想的，至少我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原因。

有趣的是，要养成模仿的技能不一定非得积极言语不可。儿童时期简单地听本族语的发音，就足以使耳朵和发音器官学会复现这些语音了。

在我们的翻译队伍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在国外成长和受教育的。一九四五年后他们回到了匈牙利。这时他们已经接近于成年人了。虽然实际上他们在此之前并不曾用匈牙利语讲过话，而只是听自己的父母说过，但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成为懂两种语言的人了。

因此，起点和方法具有很大的作用，比一切其

它的技能和才能都大得多。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事实，即：如果甲和乙同时开始学习语言，甲达到目的可能比乙快一倍。让我们进一步看看这个现象的内情吧。实际情况是：

甲学习外语的时间比乙多一些；

甲勤奋学习的动机比乙更明确，因而学习更顽强，方向也更明确；

甲的学习方法比乙更有效；

甲比乙更有教养，基础更好，因此，如果学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化学或其它科学，也会比乙快一倍。

但我依然有个感觉，本章开头部分所引的等式的左侧部分还缺乏一个负值。一个"不利系数"。这个因素也可以叫做"拘束"。

$$\frac{\text{所花的时间} + \text{目的性}}{\text{拘束}} = \text{结果}$$

"拘束"或者如心理学家所说的"闭塞"表现为怕出错，因而不开口说话。拘束也表现为不会摆脱母语影响，由于害怕失去逻辑支点，就拿母语的标准

去套外国语。(我们已经说过，有时也慌忙地抓住另一种在此之前已掌握的外语的规则。)

众所周知，男性中等学生需要开口说话时，要克服比女性中等学生大得多的拘束。伊·塔拉西在《外语教学》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讲外语时，“痛苦地经受着由于精神上发展，但又苦于无法用外语表达而产生的紧张”。

据观察，男人经受这种紧张时更为痛苦。

女人不仅不太拘束，而且比男人更渴望交际。很难设想我在多年前从北京去平壤的途中所演过的那场戏，让男人扮演会是什么样子。

我已经好几个小时一个人寂寞地坐在火车包厢里了，这时走进来一个长的很端正，面带笑容的蒙古女人。我很快就弄明白，她除了自己的本族语外不懂其它任何一种我所通晓的外语。而我对蒙语也只知道一个词“拜阿尔台”(再见)，而用这个词来开始谈话是怎么也不合适的。

我们默默地、忧郁地对坐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的旅伴从篮子里取出了食品，用手势请我分享。我

吃的时候，胃口很好，这就雄辩地证明了我对蒙古食品的好感。她发现我很感兴趣地仔细看着一种很象匈牙利奶渣饼的甜点心，好象正在猜想它是怎么做的。于是就开始了一场哑剧。一路上直到目的地，我们都在交换着烹饪方法，同时却没说过一句话。大概我把怎样切肉，滚上面包粉，打出泡沫，填馅，怎么和面，擀平，叠起来，拍打一下等等，都很好地"译"成了匈牙利语，因为从此以后，在我的食谱上就经常出现蒙古食品。我也常常十分愉快地想到，在乌兰巴托的某处有一个蒙古孩子在大嚼着匈牙利的菜。

我想，男人与女人在讲外语方面有这种差别，其原因还在于语言把说话的实质披上了一种捉摸不定的外衣。男人一般都喜欢追求实质，就象女人喜欢漂亮的装束一样。也可能不是这样。但事实是，除了教师之外，世界上女性占多数的职业就是翻译的职业。在英国布赖登市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个担任翻译工作的小组里有七名妇女，而只有一名男人。当译员们走进会场时，连最拘谨的英国人都忍不住笑了。

社会舆论夸张地宣传关于语言天才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外语知识今天已越来越显得重要；二，语言知识能把人带入一个特别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所有的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进入的人都想看一看的。多语人，即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总是激发同代人和后代人的幻想。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诵着有关他们的故事。遗憾的是这些传说并没有客观地记述古代“语言家”的知识水平。

据传说，释迦牟尼懂一百五十种语言，而伊斯兰教史则断言，穆罕默德“懂得一切语言”（?!）。阿夫拉·盖利亚证明，米特里达会讲二十五种语言。

皮科·杰拉·米兰多拉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他十八岁时就能讲二十二种语言。捷克人的骄傲扬·科曼斯基不仅奠定了现代语言教学的基础，而且除了十二种欧洲语言外，还能讲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匈牙利民族，除了读者已经熟悉的阿米尼亚·万别利以外，还产生了山多尔·克罗斯·乔姆，他掌握了十八种语言，而且编辑了世界上第一部西藏语词典。

但是，依我看，第一名的桂冠无疑应属于密佐芳济红衣主教。他获得这个荣誉不仅是因为他制订了非常有意思的新奇的学习外语的方法，也不仅仅是因为他能用许多种语言说话，还因为他没有忽视象匈牙利语这样小的、不重要的、而在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语种。

说起密佐芳济，人们总要争论，他到底能讲多少种语言。一部分历史学家断言说，他能讲一百种语言；他自己则在一八三九年写道："我懂五十种语言，再加上波伦尼亚语。"一八四六年，他已经说是"七十八种语言和一些方言"了。所有这些他都是在从未离开过意大利的情况下学会的。不仅如此，他也从来没有去过距故乡波伦尼亚四十公里以远的地方。

他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还在他上学之前人们就发现，他能正确地记住在街上偶然听到的拉丁语词，这就成了送他去学习神学——穷人能受到的唯一教育——的原因。

接连不断的战争和内讧分裂了意大利。各种民

族的伤员和即将去世的人塞满了波伦尼亚市的医院，密佐芳济经常以忏悔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的病榻前。他的方法有点象莱奥士·科舒特学习英语的方法，不过学习材料不是莎士比亚的剧本，而是他所听到的挤满了波伦尼亚市的许多民族的代表用各种语言做的祈祷。这些祷文就成为他的教材。

年轻的牧师很快就扬名国外，路经波伦尼亚的外国僧侣和上流社会的显贵人物从不错过与这位“惊人的神甫”相识的机会。对于一切“为什么”和“怎么样”，他都回答说，他所取得的成就都应归功于人类的两种著名的美德。这两种美德在穷苦人中间是最为普遍的，那就是毅力和耐心。与密佐芳济的会见，一般是在某个大厅里进行的。大厅里挤满了好奇的外国人。他从这一堆人走到那堆人，用对方提问的语言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目击者说，他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是非常流畅的，并按照来访者的要求，接过递给他的书、画和纪念册，用各种语言在上面题词，或即兴赋诗。据说，匈牙利语他也是向一些被命运安排到意大利去的士兵们学习的。

有些人断定，密佐芳济能够模仿四种匈牙利的口音。当然，这样一些离奇的传说是不足信的。但是，请允许我作为一个热爱本族语的人来引用一段密佐芳济的话。

“您知道是哪一种语言就其组合、节奏、和谐而言超过了一切其它语言，而同无与伦比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并驾齐驱吗？匈牙利语。我熟悉很多匈牙利新诗人的诗，听到这些诗的人都会被它们的音调动听所征服。如果您能密切注意未来的历史，您就会成为匈牙利的诗歌天才腾飞的见证人。这种天才一定会超过我的预言。看来，就连匈牙利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语言含有多么丰富的宝藏。”

关于学习语言的问题，这位神甫学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能做到的，每个人都能做到，只要他愿意观察语言的美好实质，并努力把它分解成为简单的人人都能理解的部分，得出准确的概念，并且铭刻在记忆中。”

“语言职业”

如果谁觉得自己是不幸的，那么心理学家一定会劝他赶快养成一种“嗜好”。我是个当事人，但我想，如果谁把语言当作自己的“嗜好”，他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真正不幸的人。如果他能够成功地在学习和使用语言中找到乐趣，那么，在绝大多数的生活场合下，他的心境都一定能保持平静。肖伯纳在《匹克梅梁》中也是这样讲的：“有嗜好的人是幸福的。”

对语言感兴趣的人，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爱好呢？通常认为，大量需要语言知识的职业首先有三种：对外贸易，公共饮食系统，为外国人服务的旅游行业。而语言职业有：语言教学，笔头翻译（专业文献和文学作品翻译），口头翻译（随从翻译和同声翻译）。本书所提到的问题，首先涉及这后三种职业。

我们的教育体制在这方面是有不少漏洞的。在匈牙利，只有教师才能受到正规的语言教育，因此，只有中学和大学教师才能传授真正的语言学知识。这一缺点在会议上、报纸上已经多次谈到过，各种统计材料也说明这一问题。显而易见，学习系统的语言知识不仅对即将选择职业的年轻人是必要的，而且对我们这些已经从事翻译工作，并力图提高自己的技能和工作质量的人也是必要的。

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财政的、行政的和教育的问题，不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们在本书范围内想谈的只是语言知识和语言知识的学习。因此，我只想指出，尽管上述三种语言职业的要求是统一的（即精通语言），但它们还需要一些极其不同的知识，还要求有一些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个人品质。

我们知道，或者切身地体会到，甚至连精通语言并有丰富经验的文学翻译家有时也会遭受挫折。如果让他去从事语言教学工作，那么失败的可能性会增长几十倍。很久以来就有人认为，只要掌握了这门语言，就可以教这门语言。现在到了纠正这种偏

见的时候了。如果语言知识不同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相结合，并附以相应的天赋的话，这种语言知识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但这条规则也可以倒过来说，许多优秀的语言教师和专家在同声翻译的小室里遭到了失败。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例如：有的优秀的同声译员（随从译员就更是如此）连多多少少通顺一点的书面译文也写不出来，反过来，专业书籍和文学作品翻译家尽管掌握了超群的笔译技巧，但当讲演者已经鞠躬坐下，可他却还在考虑第一句该怎么译……上述这些挫折不能完全用缺乏实践来解释。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谁在何种“语言岗位”上能取得成功，取决于他有哪些个人的性格倾向。

能够说明我们适合这三种职业中的哪一种职业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其次，我们要按照每个人对这三种职业胜任的情况来探讨每人的个性：翻译的、教学的和口译的个性。

当教师和口头译员的，最好是那些不喜欢离群索居和不怕“舞台灯光”的人。除了演员之外，就数

这两种职业的代表们最常在“台上”了。区别只在于演员有可能事先练习自己动作和说话的一切细节，并且此后几周、几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地扮演这个已经练熟了的角色。而教师和口头译员则每次都要遇到新的情况，他们的角色是“流动性”的。教师每次都应该对新的、再也不会重现的情况作出反应，而且在情况发展过程中临时决定自己的行动。至于口译工作者，则他的每一步都是不可预测的。

由此可见，科斯多拉尼所说的“用外语说话永远是一种妥协”，对外语教师来讲是关系不大的。然而对他们来讲，要求言语中无错误这一点却是严格的。

我再重复一遍：那些愿意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和不慌不忙地沉思的人只适合于担任笔头翻译，这种工作要比教师的工作丰富得多。例如，这种劳动的最高级的代表——文学翻译工作者，就从来不能只专门翻译一个作家，或者一个风格的作品。在人员众多的专业著作和技术著作翻译工作者大家庭中，也不会有人只翻机器制造方面的书或者艺术方面

的书。

我还记得在我口译的实践中有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美国代表专门到我的小屋中来找我，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我注意，说我在翻译一个概念时，选择了一个不准确的词："应该这样翻……这样翻……"我向他道了谢，并请他帮我翻译另一个我有点没有把握的词。他回答说："啊，请原谅，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只精通固体聚合，在它们转化为液相时，我就无能为力了。"

文艺作品和专门著作的译员们怎么能胜任这样复杂多样的任务呢？也许有万能的天才？没有。因为我们这一行职业的主宰——时间，对他们有特殊的好感。他们有时间去寻找最好的译法，到参考书、百科全书、各种专著、教科书、词典以及已经翻译出来的同类题材的著作中去找译法，最后还可以去请教专家。

至于口译者，特别是同声翻译者，他事先就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妥协这个魔鬼了。干这一行的只能是那些没患有"理想主义"毛病的人，即不是总

怕自己的产品不尽善尽美的人。他们的工作将永远是在完美的理想和无情的时间框框之间的妥协。“好的敌人是更好”这句法国谚语，只有在这个唯一的领域里不适用，因为时间这个因素是专横无情的。谁要是不能把“更好”当作“好”，那么在这个最现代化的、最有趣的职业的田野上，他就不能获得丰收。关于这个职业，请允许我用一个专门的章节来讲述。

关于翻译人员的职业

历史并没有留下关于我们这个行业的代表的材料。据我所知，第一次提到翻译人员的是普利尼。他写道，在狄奥斯库利亚已经有一百三十个翻译人员在经常工作。

罗马帝国的解体看来也埋葬了这个职业。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早期的天主教教堂中，神甫们论战有的用拉丁语，有的用希腊语，有的用希伯来语。

他们同时讲话，既不能相互理解，也不能相互说服……

当西方和东方重新建立贸易关系时，我们的翻译前辈们又重新得宠了。苏丹朝廷里常常来一些懂西方语言的对外贸易的中间人——“特拉各曼”。这个名称可能来自古阿拉伯语的“塔殊曼”（中间人）或者盎格鲁撒克逊的“特鲁格尔曼”(仆人，工人)。我抠了一天断代学之后，倾向于认为，这第二个词源更正确些。

阿·纳伊玛在《土耳其帝国编年史》一书中提到过一位唯一的“特拉各曼”，这位翻译官能讲十四种语言。顺便说一下，他是匈牙利人。

现在听起来好象有点奇怪，在文艺复兴时期口头译员这一职业兴盛起来了，因为威尼斯的和热那亚的公爵们彼此都不懂对方的语言，因而只能通过译员来谈话。就象当时的雕刻家、画家一样，我们的先辈翻译家们有自己的庇护主，有的也是朝廷的内侍官。但是这种庇护实际上不是庇护，而是压迫。如果说艺术家们在上一世纪初摆脱了这种压迫的

话，那么口头译员们要比这还晚一个世纪才摆脱了这种压迫。只是在本世纪初，即二十世纪初，译员这一职业才作为独立的行业而产生了，它是七种自由艺术的第八个妹妹。但是，它真正开始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民族和平共处的前景开始明朗化之时。这个历史的转折首先带来的是数量上的变化。在此之前，正常的国际关系是通过外交使团来实现的，而这些使团的共同语言是法语。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在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神圣同盟的代表们关于如何消除法国影响的谈判恰恰是用法语进行的。

一百三十年之后，即一九四五年，人类开始寻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合作的可能，这使翻译人员的地位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不能总是要求参加谈判的人员除了职业知识之外，再具备相应的语言知识。那些由于个人的特殊情况而会讲二、三种语言的男女，已经不能够满足对翻译人员的需求了。于是，开始有计划地在一

些专门学校里培养翻译人员。目前，这样的学校有许多种。现在欧洲的每一个大中城市都有一所引为骄傲的语言翻译学校或大学的语言翻译教研室。除了某些国家外，翻译人员职业已开始成为报酬最高的职业。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种职业要求人的全部精神力量和聪明才智高度集中，它负有巨大的责任，并常常剥夺翻译人员的自身权利。即使有很高超的技巧，也不能习惯于如此紧张并付出这么大力量的工作。

社会舆论通常对口头翻译人员不再进行分类。我们匈牙利直到解放前，即一九四五年前，很多人还认为"农民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才"发现"有贫农、中农、富农，有菜农、粮农、牧民等等。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就是把随从翻译、外交翻译(进行各种双边或多边会谈的翻译)和同声翻译（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的有特别装备的小屋子里工作的翻译）混为一谈。但在实际上，对这些不同的翻译人员的要求是不同的，他们的劳动报酬是有很大差别的，至少应该有适当的差别。

各种接待外宾的组织都招收随从翻译人员。他们的职责实际上就是为外宾服务。至于旅游翻译（又一种类型！），则必须持有特别证明，证明他已受过足够的训练（政治、历史、经济、地理等方面），也就是证明他已在专门的训练班毕了业，通过了考试。旅游翻译不同于其他翻译，他们在外国人的眼里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全权代表，是祖国的能干、老练、见多识广的宣传员。众所周知，人总是喜欢概括的，甚至当这种概括并没有根据。有时，仅仅根据几个人，甚至只根据一个人的情况就对全体人民、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特点等作出评价。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对随从翻译和旅游翻译提出很高的个人的、政治上和职业上的要求。

对所谓外交翻译，则要求他们深入细致地了解某个专门领域。他们通常是逐句翻译的，也就是在外国人所说的两句话之间或是多少完整的几句话之间的空隙进行翻译的。除了语言知识和职业知识以外，他们还应该掌握一种技能，即所谓"固位"记忆，再加上能够一边翻译一边把意义特别复杂的地方作

必需的摘记。这种技能在翻译学校里是能够学到的。

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为了节省时间采用了同声传译系统，也就是同声翻译。这种系统的实质是，翻译人员不是位于有关代表的旁边，而是在离他较远的某个地方，在一间宽敞的隔音小室里。室内配备有扩音器和隔音耳机（这样就听不见自己的嗓音，确切地说，是使自己的嗓音尽可能不淹没耳机中发言者的声音）。同声翻译者与发言者同时说话，仅仅比后者慢几个词。耳机里传来的是外语，同声翻译者把它译成本国语（这时所有其余的小翻译室都与当时的“主导”翻译室接通，而主导翻译的话又重新译成各种其它的会议语言，然后传入大厅，进入与会代表的耳机里）。如果耳机里传来的是本国语——不是来自大厅里的发言人，就是来自当时成为主导翻译室的另一个翻译小室，同声翻译者就把它译成“自己的”外语。在没有翻译室的会议地点，就使用可移动的送受话器装置，即所谓的“悄声器”。

同声翻译是最有趣的、最现代的语言职业之一，它也是不久以前才诞生的。据说，它诞生的地点和

时间是在纽伦堡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过程。

随着无线电技术和电子设备的完善，以及对各民族主权的尊重，同声翻译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公认必须允许每个国家的代表在任何国际讲坛上用自己的本国语发言，即使他本人掌握了四、五种“世界性”语言之中的一种语言。

遗憾的是，有一些人只看得起笔头翻译，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认为口头翻译是微不足道的，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的，更不需要什么聪明才智的事情。当然，翻译人员完全不必去推敲他所译的话语。有许多优秀的翻译家出色地掌握了语言，一下子就能抓住句子的语法修辞特征，能够象我们所说的那样，具有“第二记忆”，确实能做到几乎完全不去理会所译的内容。但是，从我以上所谈到的您大概能理解，这丝毫不能减轻心理上和智力上的紧张程度。医学试验测定，同声翻译者在工作时，脉搏跳动达到每分钟一百六十次，比举重运动员在举重时刻还多二十次。而脑电图则显示出一种不平常的、极限的（按照一些专家的意见）集中：大脑中心集

中在一、二格最光亮的部分。在同声翻译小室工作了十五——二十分钟之后，过度疲劳的大脑强烈地要求休息，因而开动了保护性制动器官——出现了“僵局”，这时要么靠意志的力量硬干下去，要么休息。因此，在国际会议上翻译人员是“成组地”工作的，一个小室有二至四人。小室里的翻译人员越少，落在每个人身上的负担就越重，而且更多要求的已经不是职业上的和语言上的品质，而是个人的品质。这是一种心理学的因素。至于语言学的因素，由于同声翻译还是一种崭新的职业，因而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对同声翻译的方式、方法及其可能性作出详尽的分析。但是现阶段它是口译的最高形式。

翻译的这个形式有它自己内在的困难。这种内在困难仅靠语言知识和对题目的了解是克服不了的，比这重要得多的是熟巧。借助于这种熟巧，思想（请专家们原谅我对心理学、精神生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无知）就从被译语的牢固的怀抱中冲了出来，开始急剧地换成所译语的词汇、语法、语音和修辞形式。

还有一个事实会使同声翻译的工作更加困难，那就是发言者有时并没有完全掌握标准语言：造句错误，句子不完整，由于着忙而不能准确地发音，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又复杂又不清楚，等等。俗话说得好，“是什么样的脑袋就戴什么样的帽子”。如果这样的演说者的话被译得不好（所谓不好，在翻译中的概念是广泛的：不全面，不准确，不清楚，语法和修辞不标准等），那么他只能埋怨自己。估计本书的读者中可能有现在的和未来的演说家，因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所有的同声翻译人员转达下列几点要求：1）说话时不要着急，要把每一个词都清楚地说出来，凡是已经开始讲的句子都要讲完，讲话要尽可能带表情（表情能使我们预测您的下一句话，同时选择所需要的语法结构或者语体）；2）如果您是即兴演说，请不要模仿书面语体，讲话要简明，不要怕重复同样的词汇，不要怕给人以没有口才的印象；3）如果您在开会前已经仔细地把自己的思想写在纸上，那么，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也不要使您的语言象报纸上的文章，而要使它象座谈会的记

录。要使您的语体是口语体，而不是书面语体，因为您是在发表演说。如果您的思想不允许写成简单的形式，如果您还没有学会使自己的口齿遵守纪律，那么请您给每个翻译室一份您发言的副本，要知道您是照稿子讲的，而翻译人员却是即席翻译。这就开始一场看不见的，对于非本职业的耳朵来说是觉察不到的演讲者和翻译者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输的总是翻译者，即使赢了，也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以致无法再继续这场斗争。

请允许我举例说明同声翻译与自生言语相比较会有多大的困难，思考的时间只有几分之一秒。翻译人员经常处于"绝对劣势"：他须要猜测，他现在翻译的内容过一、二秒钟后将变成什么，发言者将朝哪个方向转。

让我们拿一个需要译成外语的句子看一下。譬如说这样一句话："溶解在水里的食盐，不能用来生产这种主要用于兽医的药品。"

正象在任何一个叙述里一样，在这个句子中有一个关键的词，它表达了论述的实质，即论述中所

含有的新的成分。这是一种不仅翻译人员，而且连听取这个论述的专家们也暂时不知道的东西，是一种也只是将要在大学学习的，可能刚好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将要学习的东西。在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句中，这个事先不知道的本质成分就是《不》这个词。在俄语中，它是第五个词，但如果把这句话从德语译过来，而且还是用同声传译的方法，与发言者一起说呢？那么，德语译文听起来大致应是这样的：《Wasserlösichle Sälze eignen sich zur Herstellung dieses, hauptsächlich in der Veterinärmedizin verwendeten Medikaments nicht》。

论述的实质，说话人的目的，包含在nicht这个词中，而这个词在句中却位于最后，还不仅仅是最后，而是第十四个词！

当然，最好等听到这个可恶的“不”字之后再翻译。然而，在翻译的实践中这一点并不是经常能做到的，因为在这个关键的词出现之前，可能有很多数字、技术术语，这些都不能靠记忆，而最好是尽可能快一点把它们说出来。此外，只有发言的人才

能够停顿，沉默。他们的沉默别人大致是这么反应的："多么严肃的人哪，他不仅对所说的内容有责任感，而且对表达的形式也认真负责！"但如果是翻译沉默了，那么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半睡眠状态的代表们就会立即警觉起来："那小屋里坐着的真是一帮懒蛋！他们睡着了吧？"

因此，如果关键的词还没有出现，那么既不要沉默，也不要胡说，要机灵地等待着，插入一些我们在学习词汇那一章里说起过的"填充词"。这种词语可以找到许多，足够编一本词典的。同声翻译人员的这个国际性的手段并不是什么"禁用手段"，何况演说者的讲演本身通常要比其它讲话包含着更多这一类的废话。

大家知道，不同语言中的词序是不同的，翻译德语比较困难，因为这种语言里大都是一些称为盒式句子的非常长的句子，因为从属句中谓语的动词部分移到了最后，主句中的前缀和否定词移到了最后，而在复合动词结构中句子的基本部分就象盒子一样一个套一个。这里还得在被修饰的词的前面加

上长长的扩展性定语，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被认为是“科学的”语体，它好象能使说话者的话更有份量。这种在德语中是语体方面的问题，在日语中却非如此不可！因为日语是根本没有从属句的。

同声翻译是一种集体性的工作，同室的伙伴不仅在自己伙伴疲劳时替换他，而且帮助他翻译，帮他寻找所需要的词句；同声翻译——这是道德上的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在小室里建立安静的、愉快的气氛。

在描绘我们工作中的美好和困难时，请允许我再指出一个因素。国际性的会见已成为当前技术、经济、科学和政治合作的家常便饭。大的国际性组织，象经互会、教科文组织、国际海关协会和其它许许多多的组织，每年都召开自己的会议。许多专业的国际联合会和工会每年都召开大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每年也举行无数次的会晤来讨论政治和经济生活问题。这些会议的参加者不仅很早就相互认识，而且熟悉每个人对待各种问题的态度，熟悉他们对一些共同性问题的意见。但倒霉的是，最近的

那次大会是在巴塞隆举行的，前一次会议是在列宁格勒，而这次会议则是在布达佩斯。每个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个历史阶段又是由不同的翻译人员来翻译的，所以现在可怜的匈牙利翻译员非常苦恼，试图找到正在进行的争论的头绪。

只有热爱这一职业，才能克服这些无数的困难。我们为自己的苦果感到自豪。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更确切地说是希望，是对那些我们忠心耿耿地为之服务的专家们的希望：不要认为我们是“无法摆脱的祸害”。

从北回归线到北极圈

翻译人员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是丰富多彩的，时而愉快，时而令人沉思。也许，没有一种颜色在翻译职业的调色板上是没有的吧！有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感到疲倦，但却从未使我感到过枯燥乏味。

现在我经常回忆莫尔·约卡伊的一篇短篇小说，那还是我童年时初次读到的。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位俄罗斯姑娘，她有机会和自己的女伴们一起逃出沙皇的锡矿。几个逃跑的姑娘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流浪在没有道路的西伯利亚。她们绝望地向各种各样的上帝祈求帮助。突然，她们碰到了荒芜的坟墓。俄国姑娘扑到坟前，跪下高喊道："啊，丹奥立克普卡底德里，沃拉普尤克！"（我是按照记忆引用的，可能不对，如果谁懂沃拉普尤克语，请纠正。）其他人也都跪下，以为她们的女伴在向另一位新的比较慈善的上帝祈祷呢。但是，姑娘是在赞扬自己的老师，这位老师曾教过她沃拉普尤克语——一种世界性的人造语言。其实，墓碑上用沃拉普尤克语准确地写着走出森林的道路。这几个女逃亡者得救了。

我也曾无数次地暗中赞美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把我引导到学习外语的这一宽阔而愉快的道路上来。即使不谈那些充满了欢乐的自由涉猎的时刻，我在那通向广大世界的大门之外找到了多少惊人的

事件和印象啊！我到过欧洲的几乎所有国家，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非洲的许多国家，还到过北美和中美洲。一九六九年五月我到过北回归线地区，而八月则跨过了芬兰领土上的北极圈。

当我由一个在发音器官方面训练有素的人（象语音学家一样）变成有一半音发得一模一样的人的时候，这些回忆将会温暖我那衰老的心。

当问到我的印象时，我就会想起三次会见。下面我按年月日的顺序讲述一下这些会见。

一九五九年，我与匈牙利代表团一起来到了河内。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会见，是计划内的日程之一。接见只安排了十分钟。我想，谈话将是“礼节性”的，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样。总理指名请每一个在座的人讲一讲匈牙利代表团的成员在越南看到了哪些有意义的、值得留在记忆中的东西，同时发现了哪些必须改正的缺点。会见拖长了一个小时。

另一次会见谈的内容不是现在，而是关于过去，是关于在迷雾中隐藏了许多世纪的人类最遥远的过

去——关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这个问题上公认的权威是阿·伊·奥巴林院士和英国人乔治·德·贝尔纳尔。这两位科学家在匈牙利见面了。我很幸运，他们的谈话是由我翻译的。使我感到震惊的不仅是他们令人眩晕的博学，而且还有他们的幽默感。有一个问题贝尔纳尔怎么也不能接受对方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达成协议吧：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高声地喊道。"或者说，地球上没有生命！"奥巴林反驳说。在同他们告别之际，我请求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他们鼓励我说："请不要客气。"我请贝尔纳尔教授（据我所知，他是机器翻译的专家）不要急于完善机器翻译的装置，因为到那时我们翻译工作者将会没有饭吃了。他笑着安慰我说，机器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能代替人的翻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讲了下面的故事。

机器把英语句子《Out of sight out of mind》译成了俄语。译成德语是《Aus den Augen, aus dem Sinn》，而俄语是《С глаз долой—из сердца вон》（日久不见就忘记了）。由于机器毕竟是机器，前半

句译成《вне поля зрения》(眼不见)，后半句就以此类推译成了《вне памяти》(记不住)。在检验时把俄语译文重新投到机器中，得到的英语译文是：《lnvisible idiot》(看不见的白痴)。

很多人问，既然这个职业是如此有意义，为什么翻译人员不多呢？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对翻译人员提出的各种要求太多了。首先，要求他能迅速地思考，同时要镇静，具有良好的神经系统和坚持不懈的学习愿望。翻译人员每年要经受三十——四十次国际委员会的“考试”。“考试”的科目互无联系，如脑瘤的诊断，数学模式在农业中的应用，受热材料的机械性能，等等。

往往只是到了翻译小室里以后，才发现任务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谈一段往事。还是我刚开始我的同声翻译生涯的时候，我走进法语译员室，由于激动牙齿直打战。当然，第一次我最害怕，可是当我发现我的同室同行是个果断、沉着的人以后，我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会议的组织者要他来帮助我，如果我坚持不住的话；如

果我译错了，他会予以纠正。他立刻就开始执行这个高尚的任务。我刚说出第一句《Nous saluons les délégués de tous les coins du monde…》，他就一按钮，切断了扩音器，并告诉我说："同志，不能这样讲，地球是圆的，世界并没有角。"经过这样二、三次"指点"之后，我建议和他换换位置，让他来翻译，因为无论是材料还是语言，他都显然比我掌握得好。他对我说："好吧！我现在下去找会议的组织者，告诉他们，我们换一下。"他走了，十——十五年过去了，可他再也没有回来。

开场白和问候语通常都是公式化的，对翻译人员来说是很好的喘息机会，然而我的最难堪的回忆却恰恰与此有关。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被分配在俄语译室。会议主席在宣布开会时，表示欢迎国王的弟弟前来参加会议。其它译室早已发出了《Your Rayal Highness…》，《Königliche Hoheit》，《Votre Altesse Royale…》，而我还在痛苦地沉默着，忘记俄语应该怎么说"亲王殿下"……

使翻译人员苦恼的，有时是题目，而有时却是演说者本人。我们的一位鸟类学家在德国遇到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例子。他应邀去讲课，一个在德国学习的匈牙利学生给他做翻译。放映幻灯片时，头几句话说道："这是戴胜鸟，有两列羽毛，头上有一束蓬起的羽毛，能够抬起或者压在后面……"但是这个解说的后面却没有翻译的声音，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翻译显然很苦恼，突然他绝望地高喊："啊，总而言之，是鸟。"

另一件事情，很遗憾是与我有关的。那时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当日语翻译。我们在机场迎接一个代表团。领导我们的是我国一位喜欢华丽词藻的著名政治活动家。那时我的日语知识仅仅比说"日本——好，匈牙利——好，万岁！"稍丰富一些，但是那句负有开辟我日语翻译家前程使命的句子大致的意思是："纠纷的乌云企图遮盖日匈人民之间友好的天空是办不到的。"

有时使翻译人员苦恼的不仅是题目或演说者，而且是语言本身。我已经讲过德语的一种困难：句

子的肯定还是否定，只有在句尾才能看出来。下面的故事是马克·吐温对有关我们这种职业的笑话集的补充。这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在德国旅游，有一次他突然想到剧院去看历史剧。由于他不懂德语，就请了个翻译坐在身旁。脚灯亮了，幕拉开了，舞台上出现了主人公。他优美动听的嗓音已经响了几分钟了，可是翻译还没有说一句话。“您为什么不翻译呢？”马克·吐温推了他一下腰部。“请别说话，”这位翻译悄声说，“这一切是肯定还是否定，只有现在才能弄明白。”

因为这个，有一次我们中的一位最好的德语翻译挨了骂。他翻译一个讲演者的讲话，这个讲演者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语法结构，而我们那位可怜的同行连其中的一个动词也未抓住。“您为什么不翻译？”人家问他。“我在等待结尾，”这位翻译回答说。“请您翻译我所说的一切，”演说者怒气冲冲地说，“而不只是结尾！”

下一个例子最好不要讲给不满十六岁的孩子们听。

几年前，有一个部给我打来电话，请我去给一个非常重要的日本客人做翻译。在部里的代表们没有来到之前，我应该到旅馆去接待客人，尽可能使他不感到寂寞。我急急忙忙来到旅馆，一位看上去很年轻，待人谦虚，身体干瘦的人接待了我。我开始执行事先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问他来匈牙利访问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了一个我所不知道的日语词。我请他写下了这个词，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个词字形很复杂。但他想起在什么地方写着这个词的英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只写着唯一的一个词：SEXING（性）。

然后他立刻就问，匈牙利政府为这项活动而付给他的这一大笔美元酬劳，相当于多少匈牙利福林……

一直到我们的代表到来之后，我才从他那里得到了解释。原来我们的日本客人是鉴别出生一天鸡雏的性别的专家。他的任务是，把从养禽业观点来看的价值不大的小公鸡从小母鸡群中挑选出来。

总之，翻译们的失言和错误是举不胜举的……

你将会怎样呢，语言？

现在，我们又一次步入了未来学的领域，但我们还必须回顾一下过去。

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前的几千年间，在我们所知道的最遥远的文明时期，人类就是用不同的语言讲话的。罗马大兵团用长矛尖把拉丁语带到被征服的土地上。刻在各种石碑上的保存至今的文献，说明拉丁语曾是大罗马帝国古代的正式语言。如果我们设想一下，那时在卢西塔尼亚、密索波塔米亚、努米底亚，号召居民们缴付盐税是使用向班诺尼亚（即我们今天的匈牙利）居民说的话，那简直会使人头晕目眩！

在帝国瓦解以后，由这个国际语言而产生了所谓的罗马（拉丁）语系：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加泰兰语、布罗温斯语、摩尔达维亚语、罗马尼亚语。首先，当然是形成了拉丁语系的

方言。后来这些方言发展成独立的语言。

研究语言历史的人，实际上是在撰写人类的编年史。但这样的书所谈到的关于语言兴亡的内容广泛的历史，只能给人以肤浅的概念，就象海洋学教科书所谈到的水底世界或者食谱所描述的美味菜肴给人的概念一样。

在历史的进程中，语言时而积极地相互影响，时而又互不接触。依我看，语言之间"整体化"的过程，如今已经不可阻挡。从前，巍巍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在人类的道路上曾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时，两个相邻部落的语言差异很大，致使这些部落的代表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相互交往；而今，人类的声音不到一秒钟就可以通过无线电波飞越大洋。因此在现代的条件下，语言的隔离是时代的错误。我想，我的预言必定能够实现，我们的子孙除本族语以外，将会很好地掌握俄语和英语。

目前，在许多科技部门，英语已经逐渐成为"科学的世界语"。由于它形态简单，词形短小，它确实能被世界各国的专家们用来作为交际工具。有时我很

想知道，一个英国人看到挪威人和南斯拉夫人在讨论某个学术问题时能够互相理解，而他，一个英国人，却怎么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借助英语来做到这一点的，这时他到底怎么想的呢？常常有人问我："哪种语言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呢？"我总是这样回答："半通不通的洋泾浜英语。"

俄语成为世界性语言，是因为它非常丰富，因为用它写下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古典文学和大量的技术文献。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象它这样通过和平途径传播得如此遥远。现在不论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还是在瑞士、美洲、澳洲的大学里，都在学习俄语。我认识一位伦敦的物理学家，他想买一些在英国出版的从俄语译成英语的本专业的书。但这些书的价钱如此昂贵，以致他只好立即报名去进修班学习俄语。他计算了一下，这样要便宜得多。

语言的互相接近并不意味着某些语种的衰亡。语言是民族的生命。一九四五年末，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侵略者进行了自省。一位日本政论家委过于"日语的落后"，建议全民族抛弃它，忘记它，改用一种

欧洲语言，譬如说法语……这种念头使我不寒而栗，仿佛整个日本人民都准备进行切腹自杀，即选择“值得尊敬的死亡”。

人们只有懂得了外语，才能感到自己的母语的亲切。歌德有一次说过：“谁不懂外语，他对自己的母语也就一无所知。”

人工语言的创立者是为统一的世界语言而斗争的先锋战士。很多人听说过沃拉普尤克（人工世界语的一种），这种语言的创造者约翰·马尔丁·施莱尔曾经宣称，在这种统一的世界语中应该去掉某些语言现象，如颤音P，或者以辅音结尾的音节（闭音节）。的确，对中国人来说，这些语言现象是很特殊的。

曾创立了许多种这样的人工语言，因此在巴黎召集了一次权威性的评选会议，并从这些人工语言中选出了一种最完善的语言，这就是华沙的扎门霍夫所创立的世界语——埃斯佩兰托语。这是今日最流行的人工语言，它比伊陀语更流行，伊陀语乃是埃斯佩兰托语的完善形式。

如果认为大家接受一种共同语言后，各国人民中间所有精神上的差别就会消失，那就太天真了。孤僻的英国人和来自英国的美国人实际上是讲同一种语言，但是民族的性格在他们的各种行为中存在明显的差别。当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急躁，也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一丝不苟，然而却存在着某种因素，不管是历史的因素也好，地理的、气候的因素也好，能使我们在这一或那一民族的一些代表的行为上看到某种典型的东西，我们几乎每一步都能碰到这种所谓的“民族性格”。

只要人类还没有采用一种或两种国际语，我们学习语言的人就有一个崇高的任务，那就是在世界人民中间建筑起语言的桥梁，使人民互相接近。我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只有一个：表明建筑这座桥梁不只是运砖拉瓦。如果我们能继承先辈的知识，如果我们能满足我们对知识的渴望，那这座桥梁就会给我们带来愉快。

结 束 语

我无法更好地感谢在语言的世界中同我一起耐心漫游的人们，无法找到比齐采伦的《Pro Archia poeta》中的话更美丽的言辞：

“……这种学习能够给青年人以养料，给老年人以欢乐，使幸福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给不幸的人们提供避难所和安慰；这种学习不影响我们集会，同我们一起度过黑夜，同我们一起旅行，同我们一起去乡间。”